

分类号 F83
U D C 336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共同富裕视角下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金娜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马润平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金融专硕

研究方向: 普惠金融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_____金明平_____ 签字日期：_____2024年6月2日_____

导师签名：_____马和平_____ 签字日期：_____2024年6月2日_____

导师(校外)签名：_____ 签字日期：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_____同意_____（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_____金明平_____ 签字日期：_____2024年6月2日_____

导师签名：_____马和平_____ 签字日期：_____2024年6月2日_____

导师(校外)签名：_____ 签字日期：_____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Gansu Provi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Wealth

Candidate : Jin Na

Supervisor: Ma Runping

摘要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新的阶段，但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依然显著，这不仅阻碍了全面繁荣，还阻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步伐，这时金融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金融支持，并能改善经济发展不均的现象。尤其在甘肃省，如何有效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并推进共享富饶，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因其便捷性和公平性日益受到瞩目，其发展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明显加快。与此同时，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似乎也与其发展有所关联。因此，我们不禁思考：发展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深入理解这种联系及其对缩小差距的实际作用，对于实现全省的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依托于国内外丰富的学术资源，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甘肃省统计局的权威数据，对当前的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在理论探讨环节，我们整合了多元经济结构理论、金融创新论、金融排斥论以及金融功能论，对数字普惠金融可能产生的效应路径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基于这些理论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在实践分析阶段，我们采用了科学严谨的手段，利用 2011 年至 2022 年甘肃省各市级区域的详细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技术，结合固定效应模型，细致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壮大、渗透深度、覆盖范围以及各种金融服务功能如何具体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分析表明，甘肃省城乡收入鸿沟因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采纳和深入发展而有所减小。此外，这种金融服务的不同功能也显现出各种影响。因此，本文提出来了具体的策略推荐，包括加强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金融福利，推动数字金融产品创新，以及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体系。这些举措旨在为甘肃省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达成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支持。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城乡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 泰尔指数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but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still significant, which not only hinders overall prosperity, but also hinders the pace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is time, the financial syste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to vulnerable groups and improve economic inequality. Especially in Gansu Province, how to effective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sharing of prosperity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this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s an emerging financial service model,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due to its convenience and fairness, and its development speed has accelerated significantly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narrowing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Gansu Province also seems to be related to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cannot help thinking: Will developing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ffect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Gansu Provinc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nection and its practical role in closing the gap is critical to achiev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provinc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relies on abundant academic re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itative data of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and Gansu Provinci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o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part, we use the theory of multiple economic structure,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financial function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propose research hypotheses based on it. The empirical study conducted panel data analysis

on the data of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2, and adopted a fixed-effect regress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depth and breadth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specific impact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epening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re conducive to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 diversity of its services also has different effect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encouraging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s, and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hese measures are designed to support Gansu's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Common Prosperity; Theil Index

目 录

1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相关文献综述.....	4
1.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梳理.....	5
1.2.2 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梳理.....	5
1.2.3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梳理.....	7
1.2.4 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梳理....	8
1.2.5 文献评述.....	9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9
1.3.1 研究内容.....	10
1.3.2 研究方法.....	12
1.4 本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12
1.4.1 创新之处.....	12
1.4.2 不足之处.....	12
1.5 本章小结.....	13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4
2.1 相关概念界定	14

2.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14
2.1.2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14
2.1.3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方法.....	15
2.1.4 共同富裕的概念界定.....	15
2.2 相关理论基础.....	18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8
2.2.2 金融发展理论.....	18
2.2.3 金融排斥理论.....	19
2.2.4 金融功能理论.....	20
2.2.5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19
2.3 影响机理.....	19
2.3.1 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效应.....	20
2.3.2 缓解金融排斥效应.....	20
2.3.3 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	21
2.4 研究假设.....	22
2.5 本章小结.....	22
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24
3.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24
3.2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30
3.2.1 甘肃省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29
3.2.2 甘肃省各地市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32

3.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描述性分析.....	32
3.4 本章小结.....	34
4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6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36
4.2 变量选取及定义.....	36
4.2.1 变量选取.....	36
4.2.2 变量定义及说明.....	38
4.3 建立模型.....	39
4.4 本章小结.....	39
5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40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40
5.1.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0
5.1.2 相关性分析	41
5.2 实证检验及分析	43
5.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43
5.2.2 面板模型选择	43
5.2.3 实证结果分析	44
5.2.3 稳健性检验	49
5.3 本章小结	49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0

6.1 研究结论	51
6.2 政策建议	51
参考文献	55
致谢	62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共同富裕被深刻在社会主义基石上，它彰显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特质，是破解我国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难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路径。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随着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将增进民生福祉，尤其是推进全体人民共享繁荣作为增进人民福祉的核心策略。共同富裕的焦点在于平衡发展难题，尤其是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收窄，脱贫成果斐然的背景下，还需更深入地应对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尽管近年来实施的经济政策促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收敛，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一问题在当前社会建设中尤为突出。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和重塑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贯彻二十大关于共同富裕的使命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

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犹如脱缰野马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迅猛增长态势。自 1978 年初始的年度 GDP 值为 3,678.79 亿人民币单位，已经激增至 2022 年的天文数字般的 121.02 万亿元，这一跳跃式提升堪称全球经济史上的辉煌篇章。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跃升，从那时起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171.2 元，到 2022 年已经飙升至 36,883 元，这个惊人的 215 倍的增长见证了国家和个人财富的同步繁荣。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和个体收入的大幅增加，中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急剧扩大。如图表 1.1 所示，2003 年至 2022 年间，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率经历了波动，从 2003 年的 3.12 降至 2022 年的 2.45，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其间在 2005 年至 2007 年曾短暂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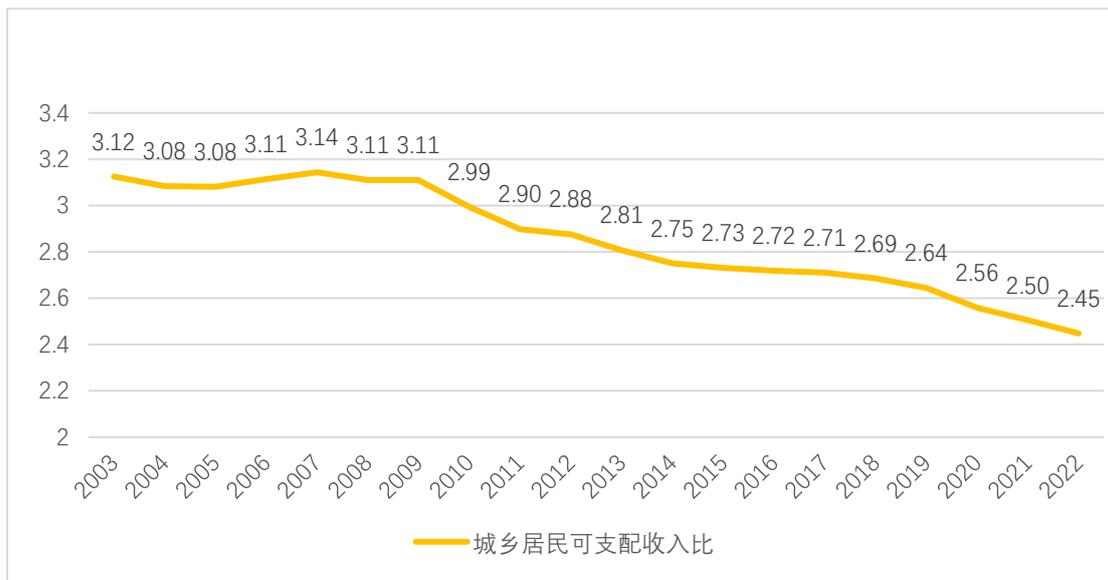


图 1.1 2003-2022 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甘肃省的经济版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变，其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也呈现出动态变化。2011 年的数据对比显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4,989 元和 3,909 元，而到了 2022 年，这一数字分别跃升至 37,572 元和 12,165 元，城乡间的增长曲线呈现出鲜明反差：城镇增长约 150.67%，乡村则实现了惊人的 211.20% 的增幅（参见表 1.1 和图 1.2）。这段时期内，甘肃省的两个地区的收入水平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

表 1.1 甘肃省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单位：元）

地区	2011	2022	增长率
城镇可支配收入	14989	37572	150.66%
农村可支配收入	3909	12165	211.20%
城乡收入比	3.83	3.09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乡间的收入鸿沟仍然明显。2011 年的城乡收入比为 3.83，而到了 2022 年虽降至 3.09，显示出政府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这一差距并未完全抹平，仍需深入挖掘解决方案，持续推动政策调整以进一步拉近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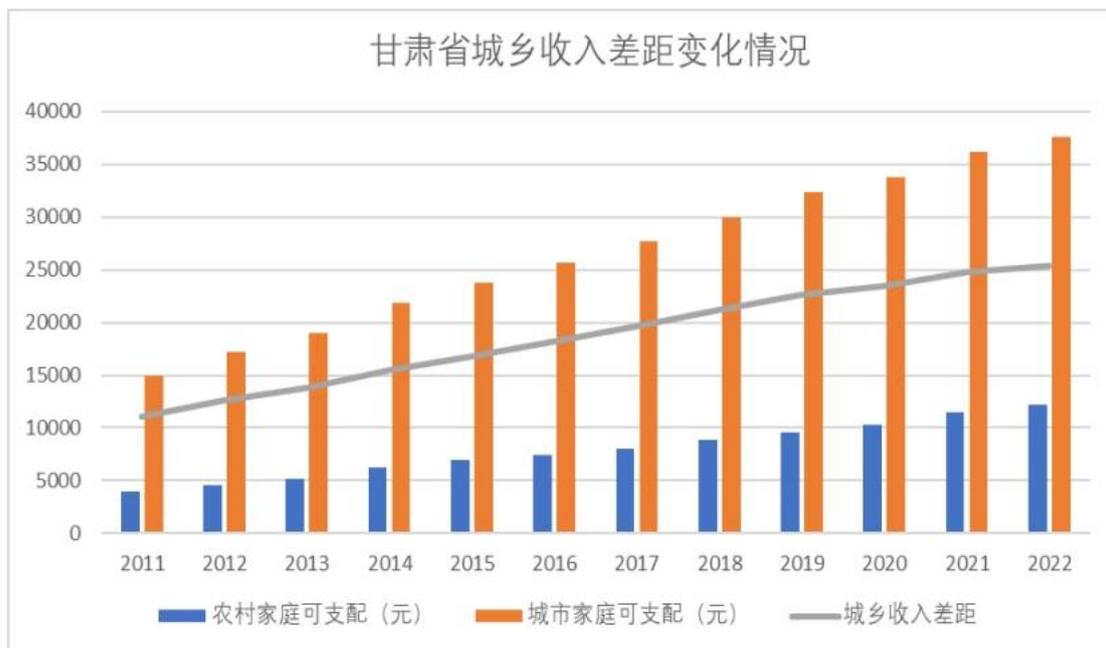


图 1.2 甘肃省 2011-2022 年城乡收入差距走势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年鉴

鉴于普惠金融的核心特性和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演变趋势，它确实在弥合城乡收入鸿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本质上讲，普惠金融如同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它拓宽了传统金融的触角，深化了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服务。然而，普惠金融在触及更多人群的同时，在覆盖范围、深度以及便捷性上展现出了其独特价值。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和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紧密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提升了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是否直接推动了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各个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有何差异？此外，不同地区和环境下，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区别？为了回

答这些问题，我们选取了 2011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案例，旨在为后续关于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1.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理论意义

理论上，学术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内在机制理解至关重要。本文以省级深度剖析，聚焦于共同富裕的视角，探究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塑造城乡居民收入的变迁，这一视角的引入为现有文献增添了新的洞察。它不仅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还预示了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数字普惠金融的探讨空间依然广阔。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传统金融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健全和强化，这将刺激更多关于该领域进步的探索，这也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规模。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项综合型的社会议题，囊括了数字技术、金融服务和经济社会的多元维度。然而，目前鲜有研究从共同富裕的角度，针对甘肃省地市级层面，深入挖掘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于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精准制定服务于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战略导向。

(2) 现实意义

近前来，中国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探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这一问题尤为棘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兴的力量，正崭露头角，它犹如一座桥梁，连接起城乡的金融网络，推动经济的双向互动与融合，从而在实质上拉近了城乡收入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充分发展。深度剖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并辅以实证研究，能够揭示市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复杂关联，为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城市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以甘肃省为例，通过对该地区金融发展的全面审视，包括对其政府相关部门在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制定和城乡收入均衡化方面的决策，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务实的政策框架，用数据支持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的策略。这不仅有助于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还能根据各市的实际状况，提出定制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助力农村地区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在甘肃省的推进，不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还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进而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这种平衡的增长态势无疑提升了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注入了强大动力。

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梳理

普惠金融理念的提倡，旨在确保金融资源公正分配，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促进社会公正。其健康发展不仅是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关键，也是社会经济稳健、均衡和有序演进的必需。然而，传统普惠金融实践常受限于时空障碍，难以充分满足可达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的核心原则，故其发展已遭遇挑战，急需寻求创新路径。

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探索中，国际上已有若干相关研究。Corrado G & Corrado L (2017)^[4]预测，数字普惠金融将是刺激经济增长和拓展经济机遇的利器。Grohmann (2017)^[12]强调，提升公众金融知识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前提，金融知识的普及将助推其更高效和广泛的应用。Demirguc-Kunt (2012)^[5]依据数字普惠特性，设计了涵盖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的普惠数字金融指标体系。Mhlanga (2020)^[15]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风险评估、信息不对称解决、客户服务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深远影响。Morshadul (2021)^[16]以孟加拉国农村为例，论证了长期的金融教育对于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关键作用。Gomber P (2017)^[10]指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增强了普惠金融的可达性。Nevvi 等 (2018)^[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为边缘化群体打开金融之门，其发展既依赖服务提供者的推动，也离不开用户的

积极接纳。Sahay et al (2020)^[19]通过新提出的金融包容性指标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并指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它在中产阶级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在国内,张倩肖(2023)^[7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信任水平高和受教育水平高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其积极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田霖和郭梦琪(2023)^[50]的研究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大大缓解农业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有效。尹应凯和陈乃青(2022)^[6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和精神的富裕,并在促进物质财富方面的作用更大。田霖(2022)^[51]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乡风文明、产业繁荣、生活富裕、生态宜居。郭峰(2020)^[27]强调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总体来看,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强区域融合、强空间整合和空间不均衡特点。易行健(2018)^[67]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大幅增加消费支出,其影响在农村、中西部和中等及以下收入的家庭中更加明显。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进通过其三个关键维度,即电子支付、保险服务和货币市场基金,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富裕阶层,贫困人群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收益中占据了更为显著的优势地位,这在减轻贫困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1.2.2 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梳理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经济学领域持续引发深度探讨,众多研究文献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来缩小这一差距。首先,Donald(2012)^[6]的研究显示,随着农业占比下降,农村居民能跨入其他行业,提高工资收入,从而减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其次,Mahmud 和 Akita(2018)^[14]强调了教育投入的重要性,指出普及初等教育并优化质量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鸿沟。Jarvis 等人(2018)^[13]的研究则关注生态资源管理,指出这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增长方面扮演关键角色。Andrei(2021)^[2]通过对罗马尼亚的研究,提高城镇化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Ezazi 和 Sanati(2015)^[20]的实证分析显示,合理的城市财政支出和收入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有益。

然而，也有学者如 Burenmende (2015)^[3]的研究则指出，国际贸易加速加剧了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Ekrem (2017)^[7]的研究指出，民主制度中的低投票率机制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支出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在欧洲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内学者同样关注这一问题，胡晶晶和曾国安 (2011)^[29]的研究发现，1987年至 2009 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收入差距尤为关键，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罗丽丽和彭代彦 (2016)^[43]的研究基于 2002 至 2012 年的数据，强调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可缩小城乡差距，政府政策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李婷 (2022)^[36]的研究则进一步细化到 1987 年至 2018 年期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整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1.2.3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梳理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学者即致力于探讨其衡量指标及其深远影响，特别是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国际学术界虽已深入理解其概念、优势及未来趋势，但在探究其与收入差距的具体关联方面，相关文献相对有限。如 Ozili (2018)^[18]着重于阐述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如提高储蓄效率、保障支付安全等，强调了数字平台在金融交易中的便捷性，认为这能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福祉。Fanta and Makina (2019)^[8]的研究则揭示了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为倒“U”型曲线。

国内学者自 2017 年起逐渐将焦点转向这一领域，尽管研究时间相对较短，但研究内容日渐丰富。许多研究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例如，伍卓和周付友 (2023)^[56]的研究发现，我们有效应用数字普惠金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是两个关键机制。赵德起和王世哲 (2023)^[76]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指出无论是高-高融合还是低-低融合，数字普惠金融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融合效应，且其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调整模型参数后依然稳固，还显示了空间溢出效应。宋晓玲 (2017)^[47]利用泰尔指数探研得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有利于大幅降低全国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开放程度和财政

支出等因素对此影响显著。周利（2020）^[80]强调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金融服务可及性和降低准入门槛来缩小城乡差距。李牧辰和封思贤（2020）^[33]则强调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普惠性的增强，这两条主要路径是可以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推动了金融在农村的渗透，减轻了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压力，降低了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1.2.4 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梳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强调的是全体人民共享繁荣，而发展包容性的数字金融是弥合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缩小收入鸿沟。

尽管国际学者通常聚焦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而非直接探讨共同富裕，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金融发展虽能推动经济增长，但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作用有限。例如，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11]认为，如果低收入者因高融资成本而无法利用金融市场，这可能导致金融发展加剧收入分化。Galo 和 Zeria（1996）^[9]进一步揭示，金融机会的不均等使得穷人难以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提升技能，进而限制了他们在高端产业的发展，而富人则借此成为创业者的先机，从而加剧了收入差距。Aghio 和 Bolton（1997）^[1]的研究则揭示了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如何放大收入差距，他们提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可能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长期趋势。

在中国，学者们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间和区域内的收入差距。在这个背景下，普惠金融因其服务的普遍性和包容性，成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建设的有力支撑。赵应云（2021）^[78]强调，普惠金融的目标在于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增强信用的可用性，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城市低收入者、农民等弱势群体。卢丁全和马利军（2021）^[42]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消费者购买力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陈东平等（2022）^[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级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缩小了城乡差距，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这些研究结

果为政策制定者在数字化时代优化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依据。

1.2.5 文献评述

经过深入文献的探究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数字金融领域，国际国内的研究者都既肯定了其带来的革新优势，也揭示了潜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策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项关键力量，通过提升金融供给和降低服务门槛，为金融边缘人群提供了更多接触金融服务的途径。然而，伴随着快速发展，监管体系的完善尚待加强。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学者们从多维度进行了深入剖析，得出结论各异。经济增长、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进程、教育投入、财政分配、经济开放度以及产业结构比例等因素，都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差距，而且各国和地区间的具体表现各不相同。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关联性，学术界展开了三个阶段的研究。首先，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复杂，有的呈现出倒“U”形，有的则显示加剧，还有可能缩小。进入普惠金融阶段，观点分歧明显，有的认为它有助于缩小差距，有的则认为可能导致扩大，还有人发现其与城乡差距的关系呈倒“U”形态。最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着重于收入不均、财富分配和经济增长，初步表明它可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鸿沟。然而，本文指出当前研究存在一些局限：

1. 地方层面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多数研究集中在国家级别或者地区间的关系，对基层和农村的具体分析有所忽视。
2.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如何通过不同金融服务类型，如支付、保险和信用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探讨尚不全面。
3. 大部分研究依赖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而忽视了从个体微观视角探讨其实际影响力度。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注重这些方面的深入探究。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在借鉴国内外研究进展和依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与甘肃省统计局的权威资料基础上，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文献，深入剖析现状，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以此成果，我们旨在为甘肃省是否采纳数字普惠金融策略，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这一工具来缩小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提供策略参考，以助力甘肃省在全面振兴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文章的框架如下：

第一章，我们首先设定研究背景，强调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要求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通过对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宏观审视，以及聚焦甘肃省的具体数据，我们揭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了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第二章，我们定义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概念，同时也界定了评估这两者的标准框架。此外，本章深入研究了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统计方法，并从金融包容性增长、城乡收入差异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第三章，全面探讨了甘肃省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借助政策文本和实例，我们勾勒出全省的发展全景，并按时间序列和地理分布揭示了各地的独特性。通过图表，我们直观展示了收入差距的时间动态和各地区间的对比。

第四章，介绍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确保数据质量，并说明样本范围为甘肃省各市。我们依据相关研究，精心挑选变量，并构建适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

第五章，进行了实证研究，首要任务是确保数据的可靠性，接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稳健性检查来巩固这一发现。

第六章，总结研究发现，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甘肃省的政策制定和实践策略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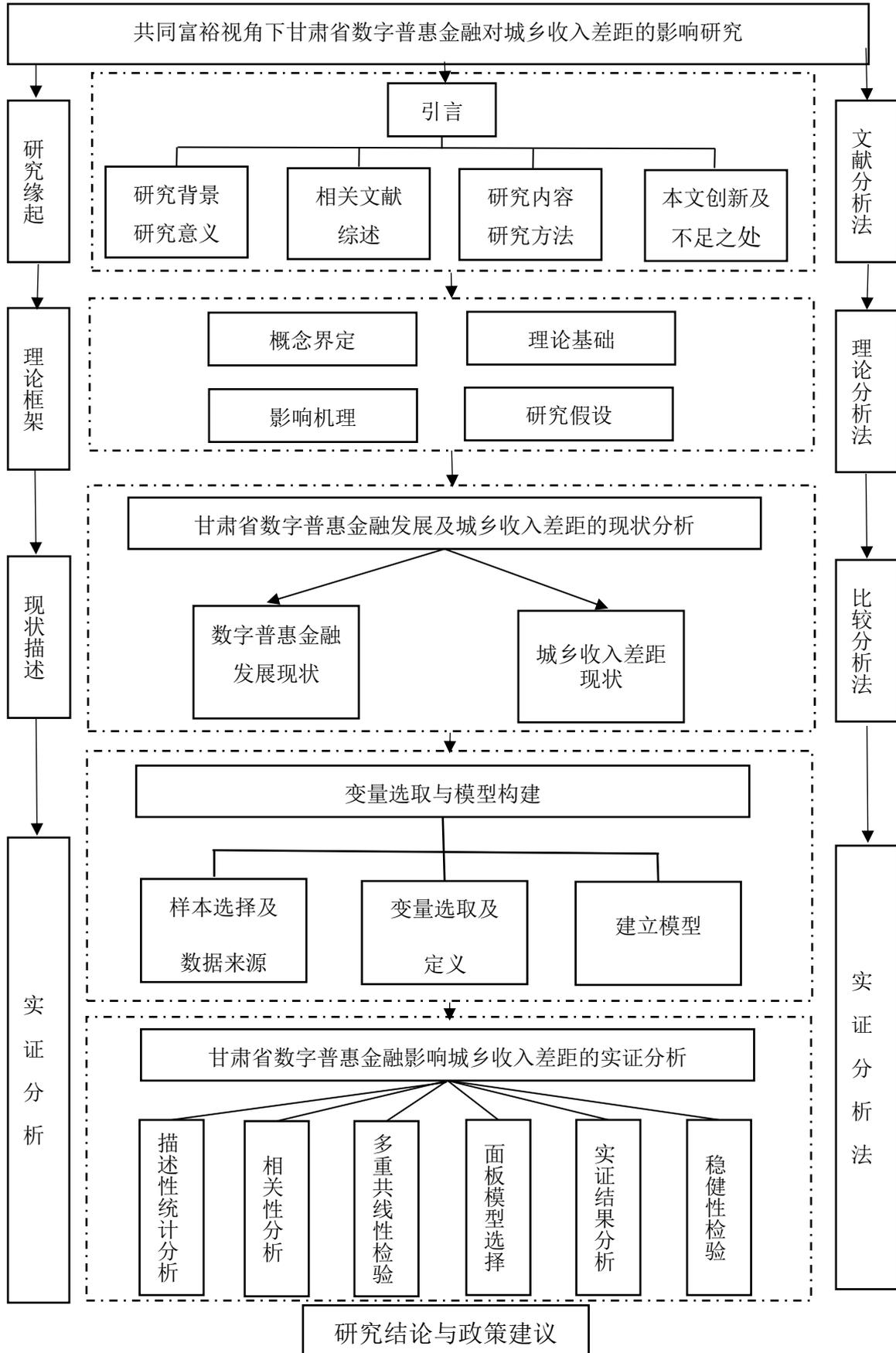


图 1.3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综述法**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梳理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学术成果。这部分着重概述了国内外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上的探索，以及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和数字普惠金融潜在影响的研究进展。这些文献的梳理为我们确立了本研究的方向和框架。

(2) **理论构建法** 本文依托多元经济学视角，包括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排斥理论和金融功能理论，以及库兹涅茨“倒 U 型”理论，构建了分析相关理论的框架，进而提出了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初步假设。

(3) **实证检验法** 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选取 2011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的数据，细致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发展阶段和金融功能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以此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4 本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1.4.1 创新之处

相较于先前的探讨，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共同富裕的崭新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对此领域做出了四点重要贡献。首先，本文在样本选择上实现了突破，不同于传统上依赖省级数据的普遍做法，我们聚焦于城市的微观层面，细化了研究焦点，从而深化了研究的深度和精度。

其次，我们运用金融功能理论，创新性地揭示了数字金融服务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运作机制，并通过严谨的实证检验，强化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此外，我们的数据源具有高度的时效性和代表性，选择了自 2011 年至 2022 年间的的数据，确保了研究结果的时效性和可靠性。我们特别引入了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充分考虑了地级市人口规模对收入的影响，增强了分析的精确性。

最后，本文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以甘肃省作为核心研究区域，其发现对于西北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全省各级市的详细分析，我们得出了更为全面且稳健的结论，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甘肃省的发展动态及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效果。

1.4.2 不足之处

论文在构建过程中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它依赖于 2011 年至 2022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但忽略了早期关键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全面审视该领域长期演进的能力。其次，该指数主要依托蚂蚁金服的数据，并通过理论权重进行整合，尽管这反映出一定的专业视角，但数据来源的单一性可能影响了对普惠金融深度和广度的全面理解，亟需引入多元数据源以增强其深度和全面性。遗憾的是，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地市级层面，对于至关重要的县域层面分析有所缺失，这无疑可能削弱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完整性。

1.5 本章小结

本章节犹如一座桥梁，巧妙地构建了论文的整体脉络。我们首先从宏观视角出发，描绘了论文探讨课题的广阔历史与实际价值，以揭示其深远的理论与现实影响力。接着，我们如同考古学家般，详尽梳理相关文献，揭示了当前领域的前沿动态与核心议题，以此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石。然后，我们深入剖析了研究策略和工具，阐述了选择的方法论路径及其在探索中的关键作用。最后，我们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出论文的轮廓，明确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突出了创新亮点，并诚实地讨论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便读者全面理解我们的研究视野和局限性。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包容性经济策略，简称包容性金融，其核心理念在于确保所有社会成员，无论贫富，都能平等地获得高质量、可持续且价格适中的金融服务。它特别强调向小微企业、农业人口以及城市低收入阶层等边缘化群体提供服务，以弥合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包容金融应运而生，它是传统普惠金融理念与前沿科技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的深度融合产物。

这种新型金融模式凭借其显著的经济效益，如低成本、高效能、广泛的覆盖面和深入的用户接纳度，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便利性。它打破了地域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得以分享到同等的金融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2.1.2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北京大学的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携手蚂蚁科技集团，将支付宝的数据资源转化为科研基石，他们运用多元统计方法，如层次聚类分析和差异系数加权，构建了一套精细的省级、市级、县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评价模型。这个体系被划分为三个主要维度，涵盖了 33 个具体指标。覆盖范围的评估依赖于账户触及的广度，而深度则通过支付活跃度、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如货币基金、信贷、保险和投资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来刻画。数字化程度则从移动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成本效益、信用体系的健全性和整体服务的便利性四个维度进行量化。整个体系的结构框架如图 2.1 所示，清晰地展示了各层面的关联与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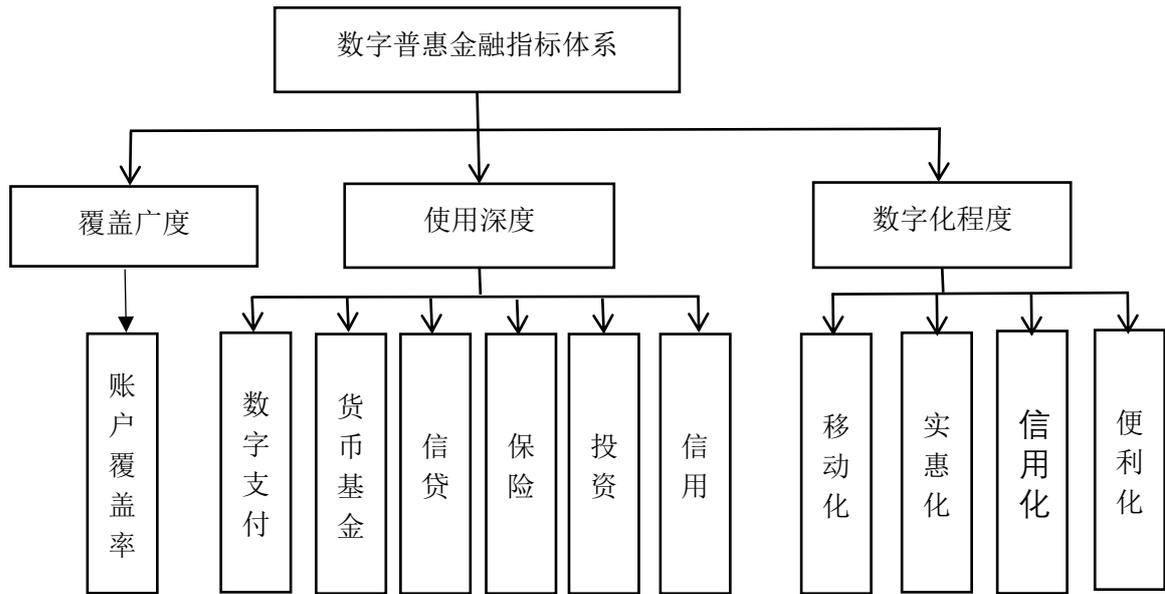


图 2.1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2.1.3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方法

目前，评估城乡收入不均的关键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尽管以往的研究者普遍采用可支配收入比来分析，这种方法便于数据获取和运算，但它往往未能充分揭示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基尼系数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首选，因其在衡量收入差距时更为严谨且全面。然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收入层次，强调了阶级差异，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极其敏感，以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微小波动都可能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

相比之下，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它同时考虑了人口变动因素，且不受中间收入阶层变化的影响。此外，泰尔指数具备两个独特优点：一是可分解性，能够从内部和外部差异两方面解析城乡收入差距，为了细腻地捕捉城乡内部及之间的收入差异动态；另一方面，考虑到全面性，该方法通过结合人口分布和收入水平来衡量甘肃省城乡的收入不均等，生动揭示了不同收入阶层的显著差距。鉴于这些优点，本文选择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标准来量化这一问题。泰尔指数的数值区

间在 0 至 1，其值域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当指数趋向于 0，意味着城乡收入差异较小；相反，指数值增高，则象征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泰尔指数的具体数学表达式如下所示（公式 2.1）：

$$Theil_{i,t} = \sum_{j=1}^2 \left(\frac{I_{ijt}}{I_{i,t}} \right) * LN \left[\left(\frac{I_{ijt}}{I_{i,t}} \right) / \left(\frac{P_{ijt}}{P_{i,t}} \right) \right] \quad (2.1)$$

在该公式表述中，j 的取值为 1 和 2，分别对应城市与农村的场景，而 I 和 P 则分别象征着地域内的收入水平和人口数量。其中，i 用来标识不同的地区，t 则表示时间维度。泰尔指数的提升暗示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

2.1.4 共同富裕的概念界定

共同繁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标识，是应对我国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路径。作为共产党人的根本追求，共同繁荣的概念包含了深远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

首先，共同繁荣是阶段性目标。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中共就提倡这一理念，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的全国大会上指出，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最终实现大家共同富裕。1992 年，他又强调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富裕是渐进的过程，允许部分地区和人群先行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愿景。这一策略分为两步：一是加速经济增长，使一部分群体和地区率先富裕；二是利用先富带动后富，通过国家政策引导，最终实现全民共享繁荣。

其次，共同繁荣是动态演进的。它既是相对指标，随时间与国际比较而变化，也是经济社会状态随发展阶段变迁的反映。

第三，共同繁荣涵盖全社会，不是局限于小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所有人的共同富裕，而非少数人的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第四，共同繁荣涵盖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丰富。如某某总书记所说，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而非仅限于物质层面，也不等于简单的平均分配。

最后,共同繁荣兼顾效率与公平。它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体现了效率原则,同时,它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在公平的机会和权利基础上,全体人民参与共建共享,实现富裕社会的公平性。

总结来说,中国推进的共同繁荣是在广泛物质基础之上,涉及全体人民而非少数人的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建共享的过程,彰显了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在 1954 年,经济学家刘易斯,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革命性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与无限劳动力供给》这部著作中,他创新性地阐述了“双部门发展模式”的概念。这个理论揭示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一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城市中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两者共同塑造了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业部门面临人口过多、土地资源有限和技术进步缓慢的问题,当农业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边际产出几乎为零,这就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经济价值,进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而言,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薪酬均高于农业,吸引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引发了农业部门内部的收入不均衡。当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第二阶段,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到制造业,整体工资水平提高,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稳定。随着劳动力持续流向现代化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导致传统部门的工人收入显著增加,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减少,最终有望实现平衡。

2.2.2 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的探索可追溯至 John G.Gurley 和 Edward Shaw 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他们奠定了金融演进的理论框架。接着,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论强调金融结构变迁在金融发展中的角色,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 GDP 的比例)作为衡量金融成熟度的指标。麦金农和肖(1973)针对

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概念，主张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认为其能刺激经济增长。

Basant K.Kapur 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他认为在劳动力丰富但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金的量和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些地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贷款供应受制于利率政策，因此建议政府放宽利率控制，以平衡市场并推动持续的经济增长。Vicente Galbis 的“两部门模型”基于麦金农的理论，强调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提升作用，通过优化资金分配，引导资源从低效部门流向高效部门，进而扩大生产规模，促进技术进步。

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出现之前，金融部门被视为需严格监管的领域，政府对资金流动和利率都有干预。然而，金融深化理论提倡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力量自我调节。核心观点是要求政府逐步放宽利率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因为金融抑制可能导致经济滞后，进而对金融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2.2.3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源于 Thrift 和 Leyshon 在 1995 年的阐述，他们将其定义为基于地理位置差异导致的金融访问限制。这一现象使农民、低收入群体和小型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从而影响他们的金融权益。它的表现形式多样且深远，主要包括以下六个维度：地理上的疏离，金融机构出于经济效率和便捷性的考量，往往忽视偏远地带的服务覆盖，同时，由于高昂的交通成本，这些地区的居民也较少寻求金融支持；价格歧视现象，金融机构为了提升收益，对不同社会阶层实行差别定价策略；评估壁垒，金融机构在风险管控中对客户信用进行评估，然而有时未能充分触及特定群体，阻碍了他们享受服务的机会；自我排除行为，部分个体由于金融知识匮乏或对风险的畏惧，主动选择避开金融服务；准入门槛，对于未能符合金融机构设定严格服务标准的人来说，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服务之外；以及营销局限，金融机构服务的地域和方式受限，进一步限制了服务的可达性。

2.2.4 金融功能理论

兹维·博迪等学者对金融功能的独特洞察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白钦先和谭庆华在此理论基石上拓展并深化了理解，他们将金融功能划分为四个层次：基本层面、关键作用、扩展效应和衍生特性。基本层面包括服务和中介的角色，核心功能聚焦于资源配置，扩展功能则涉及经济调节和风险管理，这两者合称为主导要素。衍生特性涵盖了诸如欺诈管理、信息流通、市场导向、企业治理、区域平衡发展以及财富再分配等多元议题。

按照他们的分类，移动支付被归类于基本服务范畴，而网上贷款和小额保险因其在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中的核心地位，被视为主导功能的体现。至于小额资产管理、在线众筹以及数字信用评估，则被看作是金融功能中衍生出的创新与复杂性，反映了金融活动的多元化和现代性。

2.2.5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1955年，经济学家 Kuznets 在其标志性作品《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构想，即“倒置的 U 型”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和非农业两部分的经济模型，阐述了当经济发展尚处初级阶段，农业主导，非农部门逐渐兴起，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农部门的主导地位日益显著，其增长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渐显，这促使 Kuznets 预测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将经历先增后减的过程。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在先前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他们的视角，揭示了一种新颖的关系动态：金融进步与个体收入增长之间的关联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反 U 形”特征。他们特别关注到金融市场的准入壁垒，指出那些资本充裕的人群借此享有优先接触金融服务的优势，相比之下，资本匮乏的一方则常常处于边缘化状态。因此，在金融市场的初期扩张阶段，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然而，随着金融体系的成熟、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普及，低收入群体得以通过金融途径提升财富，进而缩小贫富差距。综上所述，他们认为金融体系的持续演变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一个先膨胀后收敛的“倒置 U 型”轨迹。

2.3 影响机理

当前，甘肃省金融包容性的城乡鸿沟依然显著，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在金融服务的获取上面临着多重挑战，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居民尤为突出。然而，如今，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正逐渐重塑金融领域的格局。它不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升了服务的普及性，还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设计，满足了更广泛用户群体的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精髓在于降低了服务获取的难度，消除了对特定个体的金融壁垒，同时对经济的均衡增长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这种发展趋势有潜力减小城市与乡村间的经济鸿沟，缓解贫困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利影响，其深远效应如图 2.2 所示的框架所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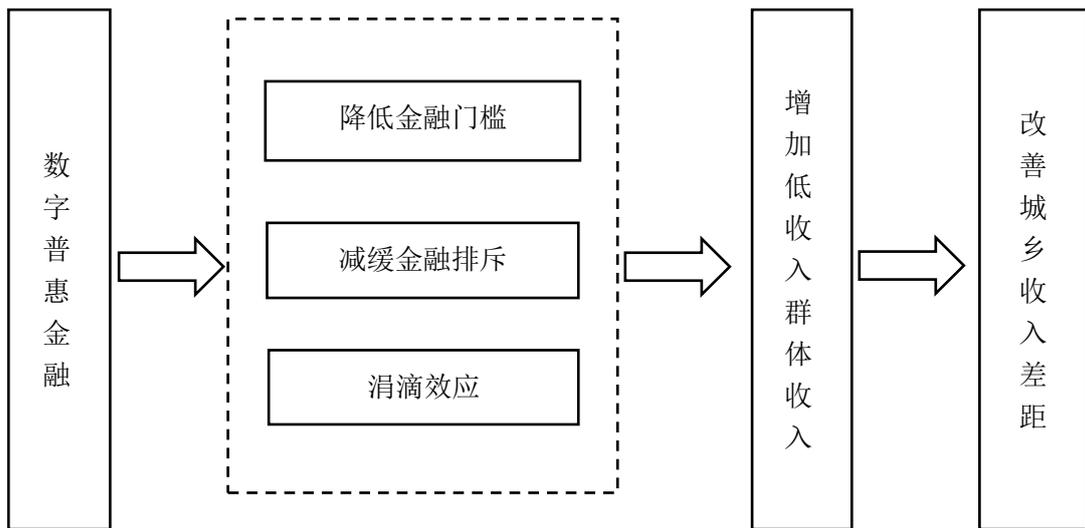


图 2.2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2.3.1 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效应

金融接入的障碍导致经济弱势群体遭受隔离，主要体现在：首要因素是，获得金融服务通常需要承担显著的费用，这对收入微薄的人群构成了严重的财务负担；其次，金融机构在提供如信贷等服务时，对客户的信用历史和资产状况有严格要求，而农户往往信用记录稀缺，且物质资源有限，难以满足抵押条件；此外，金融体系倾向于追求利润，因此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集中资源，导致农村地区

的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农民无法充分获取金融服务，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准入门槛有望降低，科技进步与农村金融网络的拓展正在填补这一空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服务，缩小收入差距。徐仁刚等人（2023）^[60]强调，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化有助于降低成本，使贫困人口更容易获取服务和参与产业发展，从而减弱了准入壁垒的影响。谢平等（2012）^[58]则指出，信息技术的力量在于其能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金融机构通过云计算等技术，便捷地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根据他们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来决定是否提供信贷或其他金融服务。借助移动网络技术，金融活动如投资、保险和信贷等可以在家中轻松完成，无需亲临传统金融机构。此外，数字化服务模式的创新进一步降低了服务成本，使低收入人群能更轻松地使用并享受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选择。

2.3.2 减缓金融排斥效应

我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格局中，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挑战尤为显著，特别是“金融排斥”现象尤为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群体的金融服务获取。首先，地理上的隔阂是关键因素，由于农村地区设立银行网点的成本高昂，导致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有限，尤其是在农村，银行网点的数量明显不足。其次，银行在贷款决策中倾向于城市居民，因为农民的收入波动较大且缺乏稳定的信誉保障，审批流程往往更为严格，使得贷款申请变得困难重重。

城市地区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多样，能满足居民多元化的需求，而农村则相对匮乏，单一的产品难以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对消费和金融管理的需求提升，单纯的传统金融产品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崭露头角，它通过技术创新，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范围，使得包括乡村和流动人口在内的更多人群能够便捷获取所需服务。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农村个人信用信息缺乏的问题，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建立全面的信用评估体系，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方式排除农村消费者。金融机构

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金融产品，更精准地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消除了社会的“排他性”，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融合。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不仅打破了地域界限，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还通过完善信用体系和产品创新，有效缓解了“金融排斥”，推动了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发展。

2.3.3 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

涓滴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体系中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渐进式策略来缓解。首先，鼓励富裕群体通过投资和积累财富，他们的盈余可以转化为市场的活跃资金，优化资金配置并降低融资成本。这个过程不仅为贫困人群提供了间接的金融支持，还作为收入增长的基石。然而，尽管经济发展可能伴随着局部挑战，如缺乏财政援助，仍需强调区域间的协同效应，通过消费升级推动就业增长，使落后地区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获益。

随着发达地区投资、产业和就业机会的增长，劳动力收益提升，带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同步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涓滴增长”现象。同时，政府福利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增强贫困群体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减少城乡间的绝对贫困差距，以缩小收入鸿沟。在发展中国家，再分配政策如补贴和失业救济等措施被用来缩小收入差距，但这可能会减缓涓滴效应，反而可能导致新的不平衡。因此，评估和利用这一机制时，需要综合考虑，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衡量。

2.4 研究假设

基于先前的研究和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传统金融体系中，低收入群体往往因严格的准入标准而难以获取服务，而数字金融的兴起降低了这些门槛，进而可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

假设 2：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应用，其在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对较小。尽管数字金融能缓解诸如地理、条件和价格等因素导致的金融服务排斥，但它在深度利用中的自限性效应可能会抵消部分缩小差距的效果。

假设 3：不同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在影响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存在差异。基础和主导功能的金融服务倾向于缩小差距，如移动支付和信贷服务；然而，衍生功能的金融服务，如针对农业的保险产品，可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甚至负面，这表明服务功能的多样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单一。

综上所述，这些假设将引导我们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在甘肃省的具体影响机制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复杂作用。

2.5 本章小结

本章节首先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全新定义及其当前评价框架，通过深入比较多种度量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构建了独特的测量框架。此外，我们还系统梳理了共同富裕理念的理论内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详细剖析了多元经济结构模型、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排斥理论以及金融功能理论的精髓，特别是库兹涅茨“倒 U 型”假说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我们探索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间的收入接入标准，金融排斥现象的演变，以及财富分配的涓滴效应，并据此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假设。

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3.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1)总体发展形势 此部分详细考察了甘肃省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全面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数。从图 3.1 可以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从 2011 年的 18.84 增长到了 2022 年的 345.22，增长了 18.32 倍，每一年的增长速率分别为 3.05、0.68、0.24、0.25、0.02、0.19、0.09、0.08、0.06、0.12、0.01，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趋势不断增长，呈现出前期发展强，后期发展缓慢。值得注意的是，2011 以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低于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水平。图 3.2 显示了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 2011-2022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及全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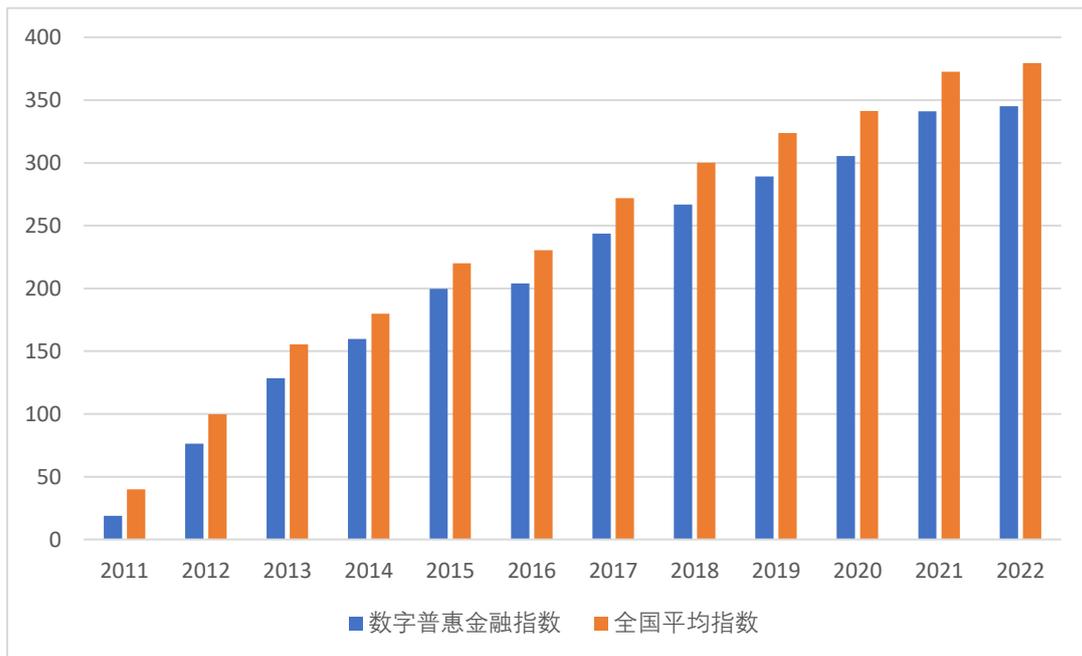


图 3.1 2011-2022 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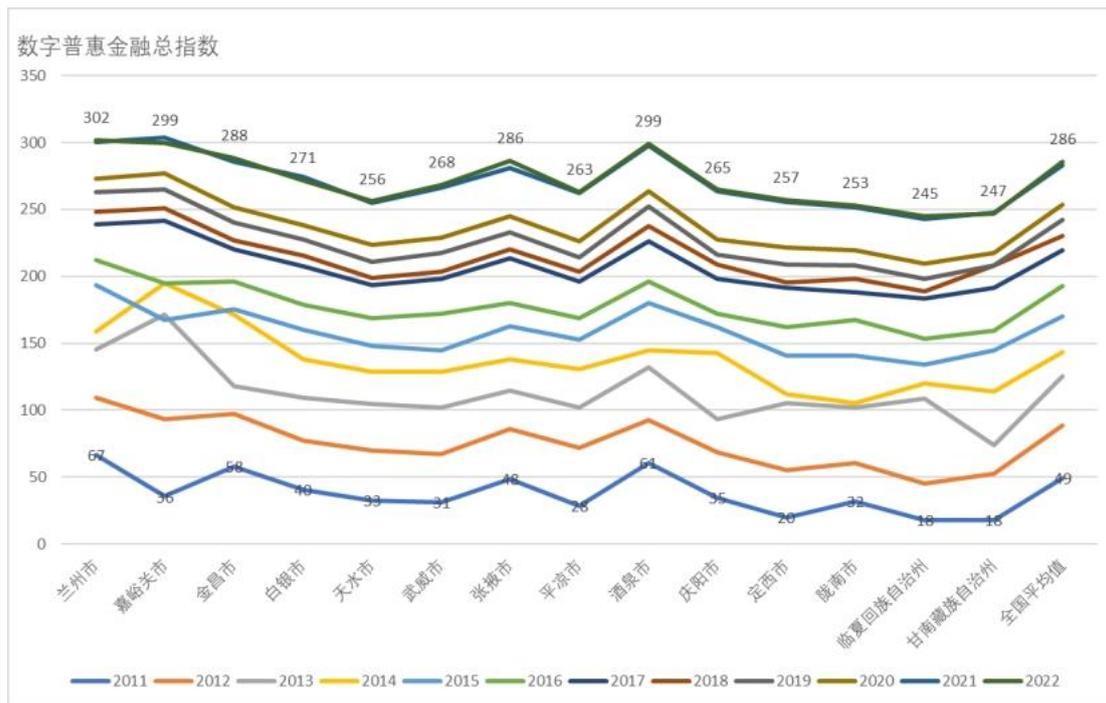


图 3.2 甘肃省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按照图 3.2 城市顺序从左到右分析得出，2022 年指数相较 2011 年分别增加 4.50、8.30、4.97、6.78、7.76、8.65、5.96、9.39、4.90、7.57、12.85、7.91、13.61、13.72、5.84 倍，除兰州市、金昌市和酒泉市外，其趋势图 3.2 所示的城市序列，自 2011 至 2022 年间，各城市的指数增长分别为 4.50、8.30、4.97、6.78、7.76、8.65、5.96、9.39、4.90、7.57、12.85、7.91、13.61 和 13.72、5.84 倍。值得注意的是，兰州、金昌和酒泉以外的所有地级市的增长度均超越了全国的平均增长率，这揭示了甘肃省其他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此外，兰州市和酒泉市在 2011 年至 2022 年的整个期间，其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均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嘉峪关市除 2011 年和 2015 年之外，其余年份也超过全国水平，金昌市在某些年份亦有此表现。然而，其他地级市在这几年间则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出甘肃省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地区差异。

(2)关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发展形势 在深度探讨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现况时，我们采取了双重视角：宽度与深度并举。关于其普及程度，我们定义的“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指数”在长达 11 年的跨度内展现

了惊人的进步。2011 年，该指数仅为 4.99，然而到 2022 年，这一数值犹如火箭般跃升至 361.07，增长率令人瞩目，高达 7236%，对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11.20 倍提升，显示出甘肃省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使用深度指数同样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甘肃从 12.76 提升至 281.44，增长了 22.06 倍，相比之下，全国平均增长率为 7.29 倍。这种上升趋势反映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在深度应用上的持续进步，深度服务策略日益成为驱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期间，数字金融服务的精细化和个性化程度不断加深。通过可视化图表 3.3，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甘肃省各市以及全国城市在数字金融普及度上的动态演变图景，揭示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轨迹和地域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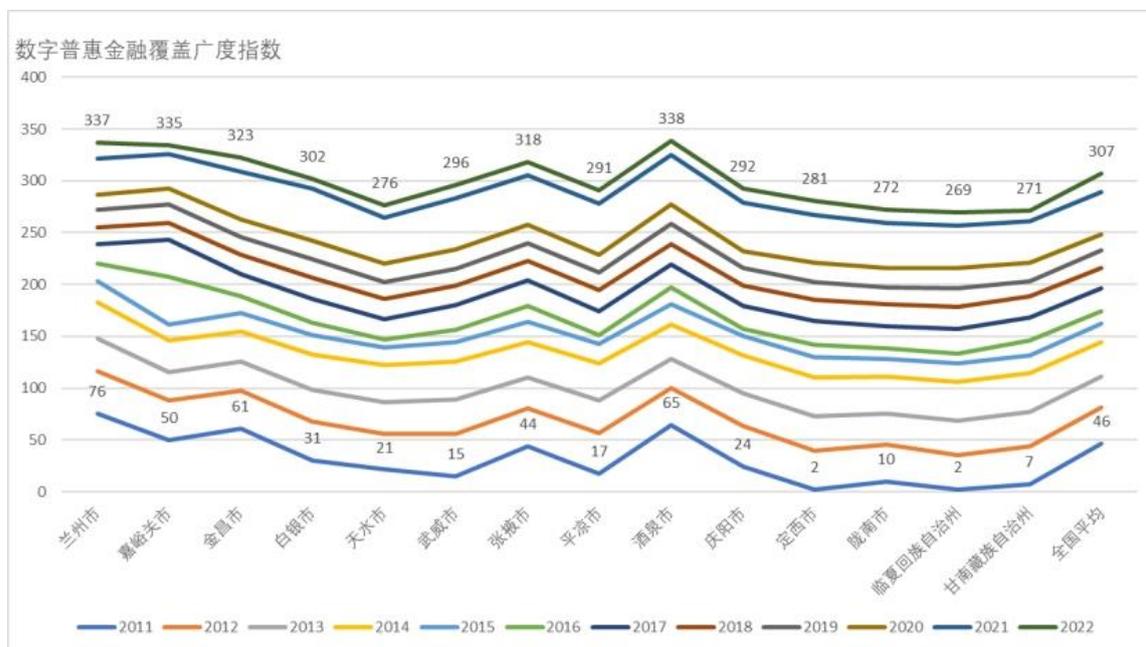


图 3.3 甘肃省地级市及全国城市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从图表分析可得，甘肃省各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大致与全国保持一致，特别是在 2021 年录得最为明显的跃升。在 2014 年前，张掖市的指标相对偏低，未达全国平均水平，但得益于快速进步，自 2014 年起超越全国，并维持领先地位。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和酒泉市始终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不过，其余区域在 2011 至 2022 年间并未能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保持同步。依据图 3.3 所示，

2022 年的覆盖广度指数差异明显。2011 年增长率分别为 4.43、6.70、5.30、9.74、13.14、19.73、7.23、17.12、5.2、12.17、140.50、27.20、134.50、38.71、6.67 倍，除兰州、金昌、酒泉三市外，甘肃省多数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速度快于全国总体，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但增长的不平衡性表明，省内各地的数字化金融服务普及不均，尚未达到全国中等水平，提升空间巨大。因此，急需定制相应策略以改善现状。

图 3.4 展示了甘肃省各市及全国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变化。嘉峪关市在 2011、2013、2019、2021 和 2022 年始终居首，超越全国平均水平。不过，甘肃省其他地级市在 2011 至 2022 年间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特别在 2016 年增长强劲，2018 年则稍有回落。值得注意的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在覆盖面和使用深度上持续全省垫底，而先进城市与其余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未显著减小，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显著。

因此，甘肃省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致力于减少城乡和区域间的差距，确保各领域与国家平均水平同步发展，实现区域内平衡且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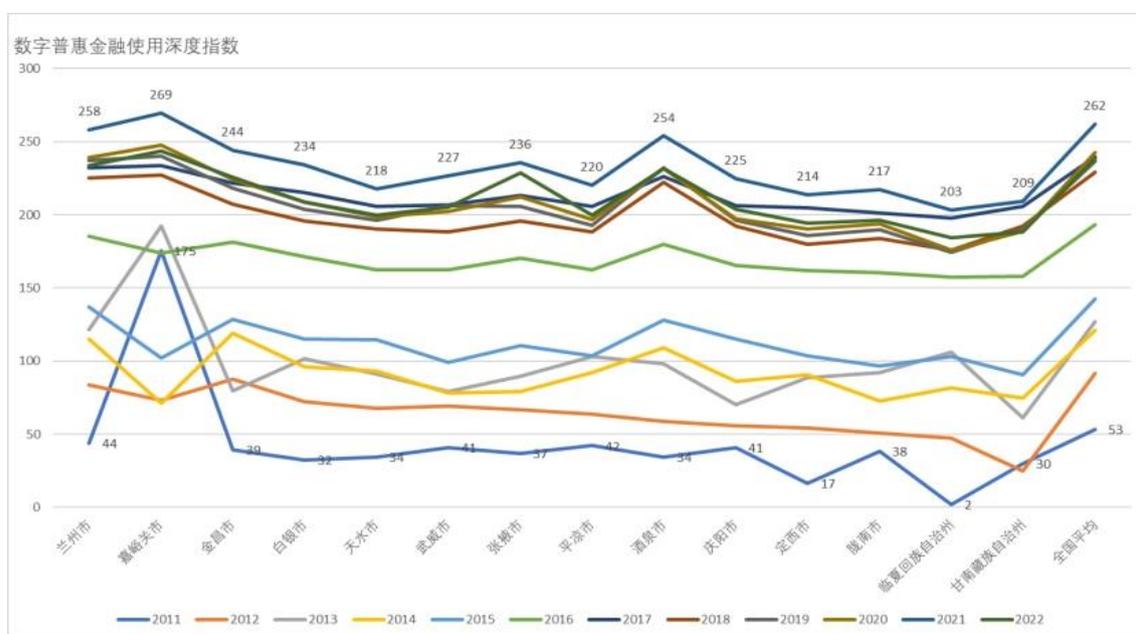


图 3.4 甘肃省地级市及全国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3)关于不同功能的数字金融服务发展形势 因数字金融服务具有多元性特点,深度研讨甘肃省可以让我们全面把握其普惠金融发展历程的独特视角。图 3.5 以详实的数据展示了从 2011 年至 2022 年, 14 个地级行政区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数字金融服务动态变迁的鲜明对比。数据显示, 整体来看, 数字支付服务呈现稳健增长态势, 其中兰州市和酒泉市引领行业前沿, 而甘南藏族自治州则展现出相对滞后的一面。值得关注的是, 兰州市的表现超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但其他城市在这一时期内多数徘徊于平均线以下, 特别是自 2016 年后, 各地的增长势头趋于平稳,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尽管如此, 这些地区尚未完全追赶上全国的整体水平。兰州市在这一阶段的卓越表现尤为突出, 然而, 随着甘肃省整体发展节奏的调整, 自 2016 年以来, 兰州市在数字支付领域的领先地位依然稳固, 且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占据显著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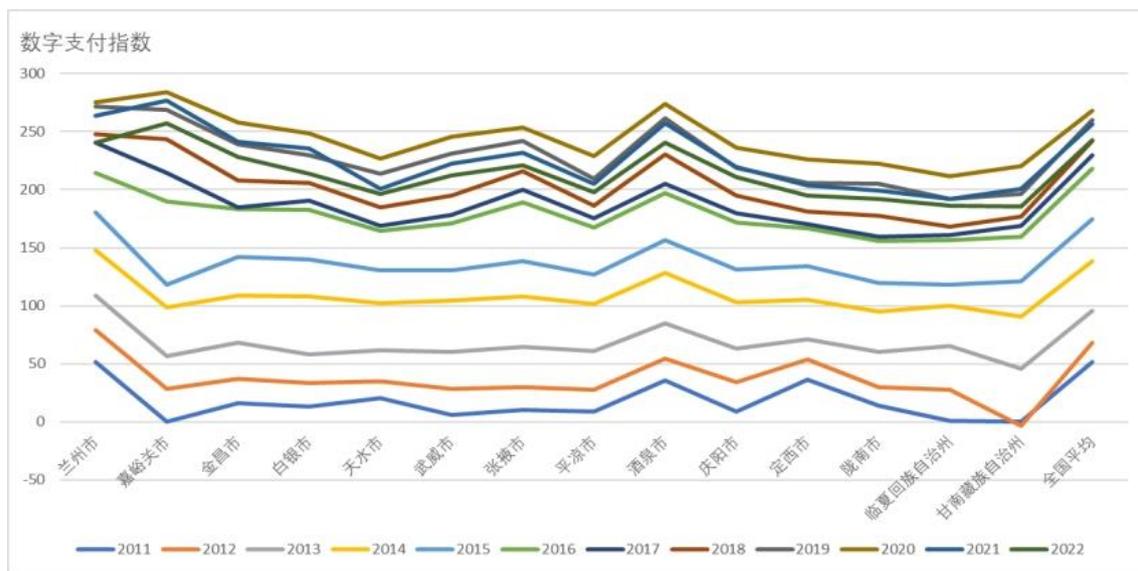


图 3.5 甘肃省地级市与全国城市数字支付服务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图 3.6 揭示了 2011 年至 2022 年甘肃省所有 14 个地级市保险服务的演变对比。在 2015 年, 保险行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萎缩阶段, 但随后的年份里, 它展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 直至 2017 年, 各个城市的保险发展状态和进步速度大致保持同一水平线上。然而, 自 2019 年开始, 甘肃省各区域的保险指标出现连

续下滑，到了 2022 年，已经倒退回 2016 年的状况，平均值明显低于全国保险指数的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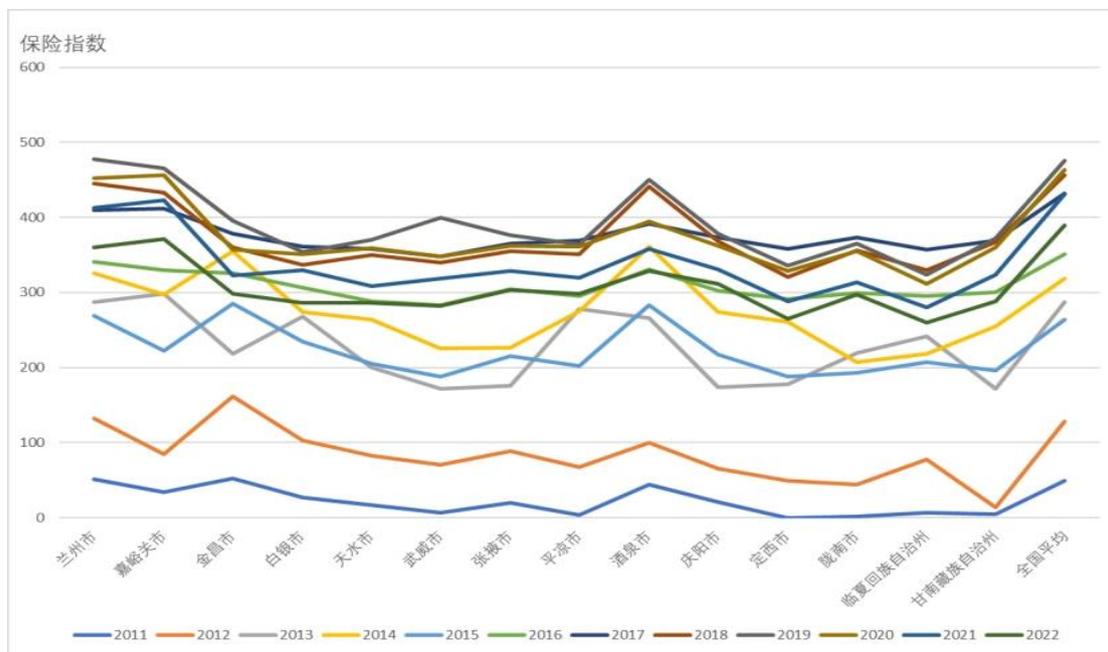


图 3.6 甘肃省地级市与全国城市保险服务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对于甘肃省，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进展、普及程度及四大金融服务的开展初期均居全国末位。这主要归因于本省特有的条件，这些因素阻碍了甘肃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步伐，未能与全国保持同步，致使甘肃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出现落后状态。

3.2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3.2.1 甘肃省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甘肃省在西部地区以农业见长，但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全国范围内人口排名第二十二，总体经济规模较小。显著的问题是城乡间的收入鸿沟颇为显著。据 2023 年的数据，甘肃省人口总数达到 2637 万。观察 2011 年至 2022 年的变迁，2011 年时，城市居民有 952.53 万人，占总人口的 37.15%，而农村居民则多达 1611.47 万人，占比 62.85%，显示出农村人口的主导地位。至 2022 年，城市

人口增长至 1350 万，占比提升至 54.17%，农村人口减至 1142 万，占比 45.83%。这一变化趋势揭示了明显的城乡人口流动趋势，鉴于城乡间在各领域的差异，这种转变可视为自然发展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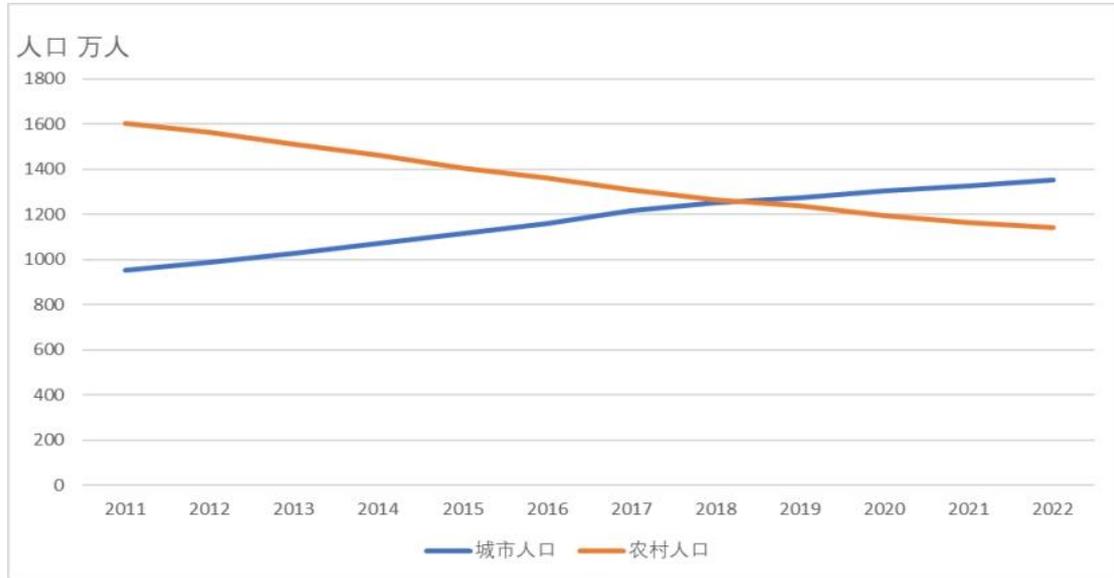


图 3.7 2011-2022 年甘肃省城市与农村人口变化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年鉴

针对城乡收入差异的情况，如图 3.8 所示，首先关注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从 2011 年的 14988.7 元到 2022 年的 37572 元，这一数字翻了超过一番，鲜明地反映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城镇居民因此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拥有了更多获取收入的途径和机会。在农村区域，2011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09.4 元，至 2022 年增长至 12165 元，几乎增长了三倍。然而，城乡间的收入鸿沟却在不断扩大，从 2011 年的 11079.3 元差距扩展至 2022 年的 25407 元，这清楚地表明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在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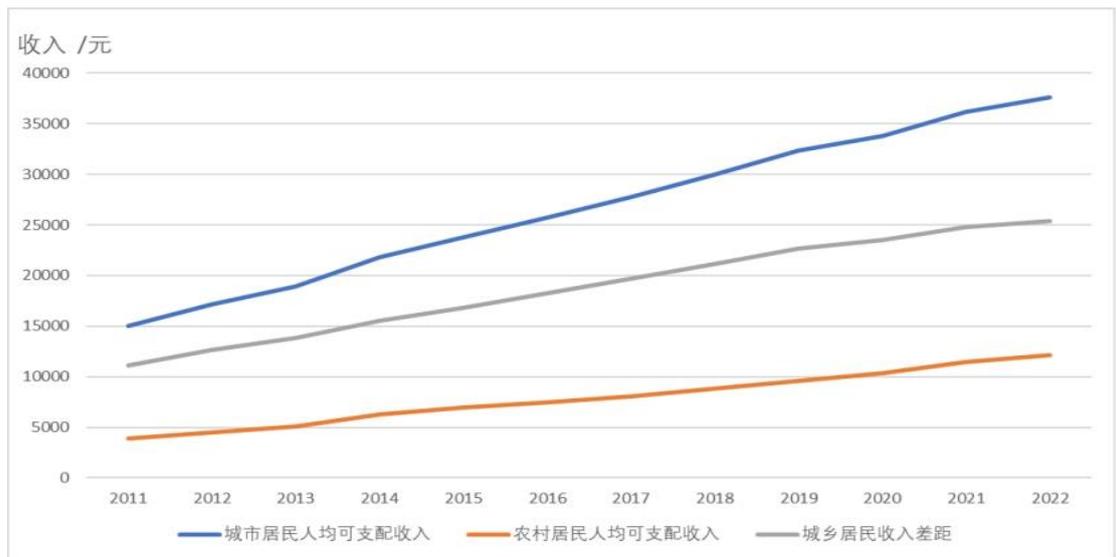


图 3.8 2011-2022 年甘肃省城市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再者，关注城乡收入比率的变化，如图 3.9 所展示，该比率从 3.83 降至 3.09，显示出尽管收入差异有所扩大，但随时间推移，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图 3.9 2011-2022 年甘肃省城乡收入比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2.2 甘肃省各地市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图 3.10 揭示了自 2011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 14 个行政区的泰尔指数逐年收窄，这象征着政策扶持下，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升。尽管各市间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但对比分析显示，天水、平凉、庆阳和陇南等地区的城乡收入鸿沟在 2022 年尤为突出，与兰州、嘉峪关、张掖和酒泉等城市的收入均衡形成鲜明对比。嘉峪关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实现了城乡发展的均衡发展，其泰尔指数位列全省最低。综合考虑甘肃省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各地区差异，可以明确指出，虽然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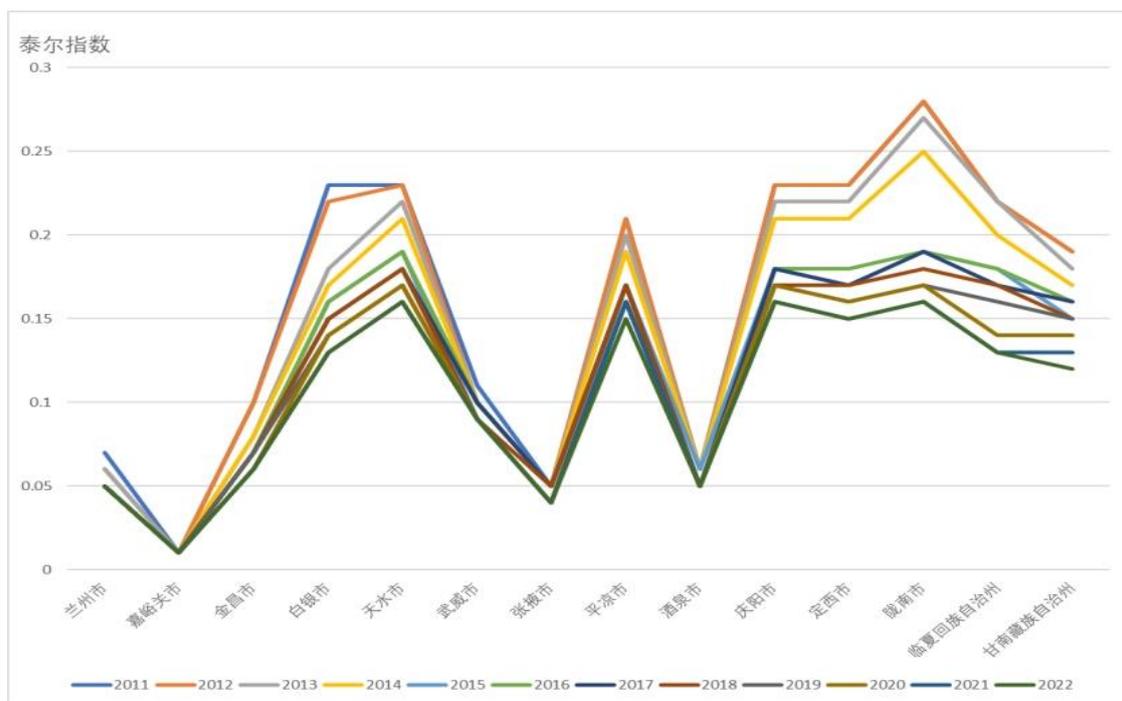


图 3.10 2011-2022 年甘肃省各地市泰尔指数趋势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年鉴

3.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描述性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2011 年至 2022 年间，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逐年攀升，揭示了该省在普惠金融领域对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架构持

续拓展和优化。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异在甘肃省逐步减小，显示出该省正逐步克服早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乡一体化进程日益成熟。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图 3.11 对比了这段时间内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城乡收入不均衡状况，通过此图可清晰观察两者随时间的演变关系，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依据。

如图 3.11 所示，一方面，泰尔指数显示甘肃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从 2011 年的 0.213 降至 2022 年的 0.128，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尤其是移动技术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 12 年内增长了约 10 倍，强调了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通过对比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曲线，可以观察到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快速提升，这与甘肃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步。这段时间内，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2015 年至 2022 年，由于前期基础设施的完备和数字化技术的深化，如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服务范围从广泛覆盖转向深度利用，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趋势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长趋于平缓，进一步证实了负相关关系。

进而言之，2011 年至 2022 年，甘肃省的这两个指标均呈现稳定的负向变动。数字普惠金融被认为是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有效手段，但仍需通过更多数据验证其效果。此外，这也突显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尽管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收窄，但这一问题尚未彻底解决。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不断引入和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借助网络平台，通过移动设备为农村弱势群体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困境，提升农村的生活质量。这同样也是甘肃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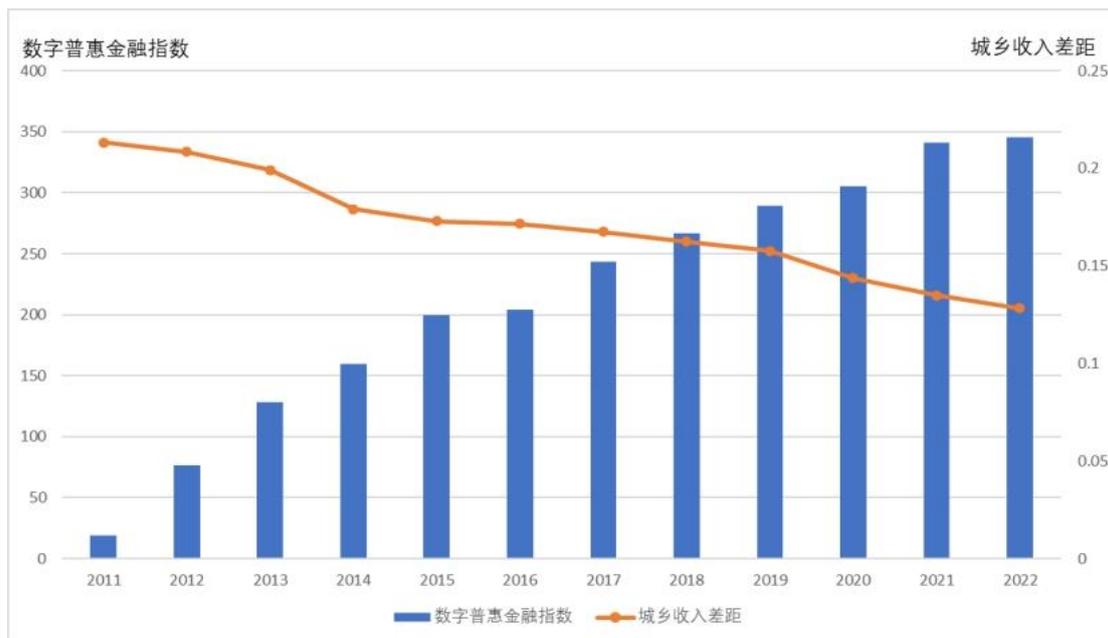


图 3.11 2011-2022 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年鉴

3.4 本章小结

本章的核心内容聚焦于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入探讨。章节初始，详尽解读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多个维度上的可视化数据，通过对甘肃省现状的剖析，以及对其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细致研究，我们发现该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在起步阶段无论是在整体水平、深度挖掘还是服务的广泛覆盖方面，都相对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归因于甘肃省在智慧化转型中的滞后，未能迅速跟进国家的步伐，从而导致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缓慢发展。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甘肃省的现状呈现出复杂性，且这一差距似乎有扩大的迹象，各地区间的收入不均衡性也显著。进一步的关联性分析揭示，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步的趋势。基于这些观察，对于甘肃省未来的规划，我们建议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和政策，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环境，推动其更稳健的增长。

4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托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省统计年鉴》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提供的可靠信息源。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选取了从 2011 年至 2022 年一系列全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作为核心影响要素，并建立了一个涵盖甘肃省 14 个行政区域的动态面板模型。所有这些数据和控制变量均直接取自甘肃省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公开报告——《甘肃统计年鉴》。

4.2 变量选取及定义

4.2.1 变量选取

本研究采取了先进的泰尔指数模型来剖析甘肃省城乡收入的悬殊状况，其核心计算元素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通过整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甘肃省统计局权威发布的详尽资料，我们构建了一个历时长久的数据框架，特别聚焦于 2011 年至 2022 年间涵盖 14 个地级行政区的动态面板数据集，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统计探究。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分析手段选用泰尔指数，以深入剖析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尽管计算城乡收入比的方法简单，且数据易于获取，但该方法未能考虑城乡人口结构的不同，因此其得出的结论可能带有偏差。基尼系数虽能揭示中等收入群体间的不平等，但因涉及人口细分，可能无法全面体现整体的收入差距。相对而言，泰尔指数以其独特优势，如能有效填补上述方法的缺陷，成为更合适的收入差距衡量标准，尤其在回归分析中，其提供的结果更具指导价值。泰尔指数的计算细节已在第二章详尽论述。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变量包括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指标（index）、覆盖范围广泛性指标（cov）、使用频繁度指标（dep）、数字化水平指标（dig）、电子支付指标（pay）、信用评估指标（cre）以及保险服务指标（ins）。所有这些指数值均经过了对数转换。

(3)控制变量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潜在影响,但这仅仅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动态因素。实际上,许多其他变量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构建模型时,重要的是精准选取控制变量,确保它们与研究的核心效应相关联,同时与我们的主要变量相关性微弱或不存在。根据大量同行的研究成果,为了提升统计稳健性并排除潜在的复杂性,我们在模型中并入了五个关键控制变量,以期获得更精确的结论。

①经济发达程度 (pgdp): 此变量通过地区GDP与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得出,以评估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对这个指标进行对数转换。依据倒“U”型假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会迅速放大,当经济成长的速度到了某个临界值时,城乡收入差距的速度就会出现缓和。邢怀振和苏群(2023)^[59]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和城乡工资性收入中的差距都会受到经济成长速度的作用,且都呈现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成长速度对西北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极限,该变量的负作用可能与被解释变量有关。

②城市化率(ur): 城市化的进程能体现一个地区劳动力迁移的程度,一般而言,城市化率越高,意味着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越少。劳动力的流动能够提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有助于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鸿沟。有研究论文提及,欧阳金琼等(2015)的论述中强调,城市化加速了城乡收入差异的变化过程。快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镇化水平、拥有不同农业劳动力资源与耕地资源的地区来说,产生三个情况:拉大、缩小与无实质。杨森平(2015)^[65]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倒U型关系阶层间,运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得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实行创新式城镇化成长路线。姚志(2017)^[62]等学者认为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是受城镇化放大的,反过来城镇化历程的增长是受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长期内,城镇化历程具有积极放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了城镇化效率的提升。

③产业结构 (is):产业结构通常通过分析第二、第三产业在区域 GDP 中的份额来体现,如李牧辰(2020年)^[33]的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转型首先能激发生产效能的跃升,而效能的提升又加剧了各产业间的不平衡动态。

④教育水平(edu):教育投入对地域发展至为关键,张驰(2016)^[70]的研究揭示了教育层次间的收益差距显著,并指出高等教育未能显著缩小收入不均衡,反而是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展现出显著效果。花亚洲(2018)^[31]的观点强调,提升城乡劳动力的教育层次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高校在校生比例与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作为一个关键的控制变量予以考虑。

⑤财政支出水平(gov):财政投入力度的衡量标准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地方财政的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以此反映地区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效能(gov)。李慧平和席玮(2021)^[32]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以“显著扩大-扩大-缩小”为特点。一般来说,各地方的政府在分配财政支出时会表现出对城镇地区的偏爱,因此优先考虑将一些财政资金分拨到城镇地区,会提高财政支出水平来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放大,具体产生的作用将会在后续实证研究中叙述。

4.2.2 变量定义及说明

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 4.1 所示,数据来源前文已作出说明。

表 4.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	theil	泰尔指数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index	北大全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覆盖广度	cov	数字普惠金融包容性指数覆盖范围
	使用深度	dep	数字普惠金融渗透指数使用频率
	数字化程度	dig	金融科技采纳指数数字化水平
	支付指数	pay	金融服务支付模块指数
	保险指数	ins	保险服务数字化指数

续表 4.1

	信用指数	cre	信用评估数字化指数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地区人均 GDP 与总人口比率
	城镇化率	ur	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产业结构	is	非农业产值在地区经济中的比重
	教育水平	edu	高等教育参与度高校学生数与总人口比例
	财政支出水平	gov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 GDP 之比

4.3 模型构建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线性模型，以实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表达式如下：

$$\text{Theil}_{i,t} = \alpha + \beta_1 \text{index}_{i,t} + \gamma_1 \text{pgdp}_{i,t} + \gamma_2 \text{ur}_{i,t} + \gamma_3 \text{is}_{i,t} + \gamma_4 \text{edu}_{i,t} + \gamma_5 \text{go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1)$$

接着，构建另一个线性关系模型，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渗透程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模型为：

$$\text{Theil}_{i,t} = \alpha + \beta_1 (\text{cov}_{i,t} / \text{dep}_{i,t} / \text{dig}_{i,t}) + \gamma_1 \text{pgdp}_{i,t} + \gamma_2 \text{ur}_{i,t} + \gamma_3 \text{is}_{i,t} + \gamma_4 \text{edu}_{i,t} + \gamma_5 \text{go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2)$$

最终，我们采用精细的线性模型来探索，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在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应用（如支付、保险、信贷）如何具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表述如下：

$$\text{Theil}_{i,t} = \alpha + \beta_1 (\text{pay}_{i,t} / \text{ins}_{i,t} / \text{cre}_{i,t}) + \gamma_1 \text{pgdp}_{i,t} + \gamma_2 \text{ur}_{i,t} + \gamma_3 \text{is}_{i,t} + \gamma_4 \text{edu}_{i,t} + \gamma_5 \text{go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3)$$

上述式中： $\text{Theil}_{i,t}$ ——指第 t 年 i 地区的泰尔指数；

α ——一个与所有因素独立的常数；

β_1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γ ——解释变量的关联系数；

ε ——随机扰动项。

4.4 本章小结

在本章节的初始部分，我们将探讨数据的源头，这源于连续多年的甘肃省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珍贵资源。通过对这些丰富且详尽的数据进行整合，我们精心构建了一个时间段跨度从 2011 年至 2022 年的庞大数据矩阵，涵盖了全省 14 个地级行政区的深度分析。我们对其中的关键变量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入解读。在明确研究假设并根据变量筛选原则后，我们确立了一套科学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此为基础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

5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5.1.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5.1 揭示了各项指标的统计特性。数据显示,泰尔指数的平均数为 0.127,标准偏差为 0.069,这个较高的平均值揭示了甘肃省各市级地区城乡劳动力收入分配的显著不均等现象。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标(index)的均值为 5.037,其显著的极差反映出各地域间发展的显著差距,未能实现平衡增长。

表 5.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heil	168	0.127	0.069	0.010	0.280
index	168	5.037	0.612	2.881	5.715
cov	168	4.956	0.836	0.631	5.824
dep	168	4.863	0.681	0.663	5.596
dig	168	5.337	0.541	1.221	6.365
pay	168	4.752	1.114	-3.912	5.648
ins	168	5.370	0.967	0.698	6.169
cre	168	4.630	0.566	3.056	5.265
pgdp	168	10.23	0.707	8.706	11.86
ur	168	0.459	0.222	0.088	0.937
is	168	0.841	0.084	0.676	0.987
edu	168	0.017	0.035	0.001	0.330
gov	168	0.430	0.273	0	1.302

在影响因素中，数字普惠金融深度（dep）的标准偏差小于广度（cov），这意味着区域内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服务深入程度存在显著不一致。在三个金融服务指数中，数字支付（pay）的标准偏差最高，为 1.114，显示出数字支付服务在不同地区间的扩散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作为经济增长衡量的控制变量，人均 GDP（pgdp）平均值为 10.23，标准偏差为 0.707，这表明甘肃省各市级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进一步造成人均收入水平的悬殊。教育方面，平均高等教育水平（edu）的平均值仅为 0.017，标准偏差为 0.035，较低的标准偏差意味着城市间教育投入的差异相对较小，但较低的平均值则暗示，甘肃省城市教育质量有待提高，教育投资能力有待提高。

5.1.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为了防止因为核心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线性相关太高而导致产生了伪回归现象，本文展开了对变量的相关性和共线性分析，对其进行了计算，如表 5.2 所示，相关系数基本都低于 0.9，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具有相关性。

表 5.2 相关性分析结果

	theil	index	cov	dep	dig	pay	ins	cre	pgdp	ur	is	edu	gov
theil	1												
index	-0.444***	1											
cov	-0.497***	0.984***	1										
dep	-0.375***	0.958***	0.912***	1									
dig	-0.267***	0.924***	0.878***	0.858***	1								
pay	-0.378***	0.968***	0.948***	0.931***	0.911***	1							
ins	-0.333***	0.888***	0.897***	0.830***	0.854***	0.901***	1						
cre	-0.283***	0.825***	0.761***	0.911***	0.720***	0.782***	0.581***	1					
pgdp	-0.820***	0.470***	0.519***	0.408***	0.284***	0.385***	0.348***	0.313***	1				
ur	-0.729***	0.336***	0.371***	0.299***	0.182**	0.293***	0.255***	0.208***	0.867***	1			
is	-0.380***	0.208***	0.237***	0.196**	0.089	0.178**	0.218***	0.069	0.636***	0.666***	1		
edu	-0.346***	0.133*	0.150*	0.128	0.044	0.139*	0.114	0.088	0.313***	0.366***	0.335***	1	
gov	0.561***	-0.073	-0.125	-0.016	0.052	0.005	0.020	0.016	-0.704***	-0.745***	-0.486***	-0.223***	1

5.2 实证检验及分析

5.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首先，我们计算了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以此作为初步判断多重共线性问题的依据。利用 stata15.0 进行分析，数据显示，pgdp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达到最高，为 6.22，而 edu 变量则显示出最低的值，为 1.16。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3.21，这个数值显著低于通常设定的阈值 10。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变量之间并未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 5.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VIF	1/VIF
gdp	6.22	0.161
ur	5.75	0.174
gov	2.59	0.386
is	2.06	0.486
index	1.46	0.684
edu	1.16	0.864
Mean VIF	3.21	

5.2.2 面板模型选择

在本研究中，F 统计量的计算结果为 66.530，其对应的 p 值为 0.0000，这表明固定效应对模型的影响显著超过 OLS 方法。进一步的 LM 检验揭示了一个 455.560 的值，伴随着 p 值 0.0000，显示出混合效应在对比随机效应模型时占据优势。借助 stata 软件进行的 Hausman 检验，我们观察到 54.010 的统计量和同样为 0.0000 的 p 值，这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观点。综上所述，通过对三种不同的检验方法的综合评估，我们确定最适宜的回归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

表 5.4 检验结果

检验名称	统计量	P 值
F 检验	66.530	0.000
LM 检验	455.560	0.000
Hausman 检验	54.010	0.000

5.2.3 实证结果分析

(1) 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效果分析

表 5.5 展示了对甘肃省普惠金融总体进展对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的回归模型。

表 5.5 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1) Theil	(2) Theil
index	-0.029*** (0.005)	-0.017*** (0.005)
pgdp		-0.031** (0.014)
ur		-0.048 (0.076)
is		-0.089 (0.069)
edu		0.065** (0.024)
gov		0.006 (0.007)
_cons	0.275*** (0.025)	0.617*** (0.157)
N	168	168
R2	0.587	0.661
个体控制	Yes	Yes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差水平。

表 5.5 (1) 部分的深入剖析显示, F 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为 0.000, 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模型内变量间线性关联在极低显著性水平下的存在, 具体为 1% 的置信区间。具体来说,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 (index), 其系数为-0.029, 并且呈现出负向且统计上显著的趋势。这意味着每增加 100 个单位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泰尔指数预计会下降 2.9 单位, 这一现象暗示在甘肃省,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能有效缓解城乡间劳动收入的不平衡, 验证了假设 1 的合理性。假设 1 的有效性体现在, 全面普及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均衡城乡经济资源分配具有显著作用, 从而有助于缩小甘肃省城乡居民的劳动收入差距。

表 5.5 (2) 中的数据显示, 在纳入控制变量后,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全面指标 (index) 的估计值为-0.017, 这一结果在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依然维持, 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最初的假设 1。其中, 地区人均 GDP (pgdp) 的系数为-0.031, 尽管其显著性仅为 5%, 但不容忽视, 它揭示了当其他因素恒定时,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 GDP, 泰尔指数相应地下降 0.031 点, 这清晰地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动态。基于这种倒“U”型理论, 回归分析深入挖掘出甘肃省城市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超越了预期的倒“U”曲线峰值, 这意味着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有潜力减小城乡间劳动收入的不均衡。

(2) 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效果分析

表 5.6 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效应。

表 5.6 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发展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1) Theil	(2) Theil	(3) Theil
cov	-0.011** (0.004)		
dep		-0.010** (0.004)	
dig			-0.007 (0.004)
pgdp	-0.034* (0.016)	-0.042** (0.016)	-0.053*** (0.014)
ur	-0.064 (0.073)	-0.068 (0.075)	-0.067 (0.090)
is	-0.088	-0.085	-0.099

续表5.6

	(0.067)	(0.071)	(0.067)
edu	0.058**	0.068**	0.062**
	(0.024)	(0.024)	(0.025)
gov	0.001	0.001	-0.007
	(0.006)	(0.007)	(0.008)
_cons	0.629***	0.704***	0.820***
	(0.169)	(0.165)	(0.140)
N	168	168	168
R2	0.656	0.638	0.621
个体控制	Yes	Yes	Yes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差水平。

表 5.6 的分析结果显示，F 统计量的联合概率小于 0.000，这证实了模型中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联，且显著性水平达到 5%。

观察表 5.6 的第一部分，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cov）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011，这意味着当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增加 100 个百分点时，泰尔指数预计会减少 1.1 个百分点，显示出甘肃省通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能有效减小城乡收入差异。此外，人均 gdp（pgdp）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034，表明人均 GDP 比例与收入不平等呈负相关。另一方面，教育水平（edu）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 0.058，意味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加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则不那么显著。

根据表 5.6 的第二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dep）同样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作用，其回归系数为-0.010，显示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深化每增加 100 个百分点，泰尔指数将降低 1.0 个百分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它在缓解城乡收入差异上的重要作用。同时，人均 gdp（pgdp）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42，显示地区人均 GDP 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然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并不突出。在综合考察首两部分的数据后，我们观察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与深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双重贡献相当显著，从而强有力地证实了假设二的可行性。然而，进一步分析表 5.6 的第三部分揭示出一个不同的动态，即数字化程度指标（dig）并未呈现出决定性的影响力。这暗

示了目前甘肃省在数字化进程中对提升民众生活福祉的实际效益可能并不如预期那样显著。

(3) 不同功能的金融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分析

表 5.7 显示了不同功能数字金融服务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效应。

表 5.7 不同功能的金融服务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1)	(2)	(3)
	Theil	Theil	Theil
pay	-0.004 (0.003)		
ins		-0.005** (0.002)	
cre			-0.014** (0.005)
pgdp	-0.051*** (0.014)	-0.049*** (0.015)	-0.037** (0.013)
ur	-0.065 (0.088)	-0.067 (0.087)	-0.054 (0.088)
is	-0.101 (0.067)	-0.084 (0.070)	-0.097 (0.070)
edu	0.066** (0.024)	0.061** (0.025)	0.070** (0.024)
gov	-0.005 (0.007)	-0.002 (0.008)	0.003 (0.007)
_cons	0.786*** (0.147)	0.757*** (0.153)	0.679*** (0.148)
N	166	167	163
R2	0.617	0.616	0.641
个体控制	Yes	Yes	Yes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差水平。

表 5.7 的分析结果显示，F 统计量的联合概率小于 0.000，这证明模型内的变量间线性关联在 5% 的置信度下具有显著性。

观察表 5.7 的第一部分，数字支付指标 (pay) 并未显示出显著的影响力。尽管数字支付服务理论上能够减少甘肃省村民对实体银行的依赖，降低现金携带的需求，促进劳动收入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在控制变量中，人均 GDP

(pgdp) 以 1% 的显著性水平出现, 其负向系数强调了经济发展如何有助于缩小城乡间的劳动收入差异。

表 5.7 的第二部分揭示, 保险指标 (ins)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影响, 回归系数为-0.005, 这意味着保险指数每增加 100 个点, 泰尔指数将减少 0.5 个点, 显示出甘肃省的保险服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关联。这既反映了保险服务在甘肃省的良好进展, 也证明了核心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在减小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上的积极作用。同时, 人均 GDP (pgdp) 的系数为-0.049, 同样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指出人均 GDP 与泰尔指数的负相关性, 暗示甘肃省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已过了“倒 U 型”曲线的峰值, 经济进步将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表 5.7 的第三部分, 信用指标 (cre)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影响, 其回归系数为-0.014, 意味着信用指数每提高 100 点, 泰尔指数减少 1.4 点, 显示了信用服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负向关系。这一发现不仅表明信用服务在甘肃省的实施取得了进展, 还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扩展功能有助于缓解甘肃省的城乡收入不平等。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和扩展功能有助于甘肃省城乡居民劳动收入差距的减小, 但其基础功能却未达预期效果, 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发展的不均衡性, 验证了假设 3。

5.2.3 稳健性检验

该文探究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 以及服务的普及范围、使用程度、数字化水平和职能作用。对于研究结果的建定性, 仍有待深入分析。

在计量经济学的范畴内, 通常遇到的挑战是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双向因果混淆, 但在我国互联网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 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尽管金融科技的疾速演进普遍关注, 但它实际上并不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为主要目标。从理论上讲, 城乡收入的不对等不太可能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逆向推动作用, 因此, 在这种背景下, 因果关系的双向影响并不合理。

为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替代方法,以甘肃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Incig),用以替换原有的泰尔指数进行稳健性测试。表 5.8 呈现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整体情况、覆盖面、渗透度、保险指标和信用指标等核心自变量的检验结果。

表 5.8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型检验

	(1) Incig	(2) Incig	(3) Incig	(4) Incig	(5) Incig
index	-0.202*** (0.067)				
cov		-0.131** (0.044)			
dep			-0.115** (0.046)		
ins				-0.068** (0.026)	
cre					-0.154** (0.064)
pgdp	-0.343** (0.159)	-0.384** (0.172)	-0.487** (0.166)	-0.547*** (0.148)	-0.456*** (0.148)
ur	-0.116 (0.680)	-0.318 (0.656)	-0.369 (0.693)	-0.330 (0.801)	-0.215 (0.789)
is	-1.207 (0.869)	-1.199 (0.841)	-1.173 (0.898)	-1.114 (0.870)	-1.309 (0.880)
edu	0.648* (0.309)	0.567* (0.303)	0.681** (0.306)	0.598* (0.312)	0.707** (0.305)
gov	0.021 (0.064)	-0.037 (0.064)	-0.041 (0.067)	-0.049 (0.076)	-0.042 (0.096)
_cons	8.534*** (1.900)	8.699*** (1.935)	9.657*** (1.908)	10.013*** (1.669)	9.542*** (1.826)
N	168	168	168	168	168
R2	0.663	0.657	0.634	0.619	0.630
个体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差水平。

表 5.8 (1) 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该指数(index)在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收入差距,与前期分析相吻合,只是具体的影响强度有所差异。

在表 5.8（2）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指数（cov）作为关键变量，其负向影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证实，系数值为-0.131。而在表 5.7（3）中，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指数（dep）同样以 5% 的显著性水平呈现负向关联，其系数值虽小于 0.131，但与先前的回归分析在显著性和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

表 5.8（4）的分析指出，保险指数(ins)作为核心变量，其负向效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确立，与早期研究结果相符，只是具体数值有所不同。至于表 5.8（5），信用指数(cre)的回归结果显示，它也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出负向关系，与之前的回归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总结来看，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5.3 本章小结

本节首先确认了模型的有效性，经比较后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几点：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进步显著缩小了城市与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鸿沟。在甘肃省，这种金融模式有助于缓解城乡间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可作为策略工具来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进而推动经济的高品质发展；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超过其深化使用。普及程度的提高减少了地域、条件、成本及市场排斥等因素，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了城乡居民间的劳动收入不均问题，这四种排斥同样影响着深化使用的普惠金融，加强了自我排斥效应，进一步抵消和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最后，不同类型的数字金融服务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有差异。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尤其对于传统金融服务未能触及的群体，这一变化为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促进城乡收入均衡创造了可能，进而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尽管甘肃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版图中显得较为滞后，其整体规模与人均收益有待提升，面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严峻任务。本文围绕甘肃省“十四五”规划中的“数字化转型”策略，依托文献调研、理论剖析和实证数据分析，针对 2011 至 2022 年间甘肃省 14 个地级行政区的详尽数据展开深入探究，得出了一系列关键发现：

(1) 数字普惠金融的总体发展能够明显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通过运用和分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甘肃省统计局的权威数据，我们揭示了甘肃省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成为在缩小城乡收入鸿沟中的关键作用，甘肃省可以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解决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手段，助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事实上，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而非仅仅提升其深度，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为有效。广泛的普及能够削弱地理、条件、定价及市场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显著缩小了城乡劳动力收入的鸿沟。同样，这些排斥因素在深度使用服务时也起着类似的作用，抵消了部分收入差距。

(3) 不同类型的数字金融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有侧重。尽管基础的数字支付服务在缩小城乡劳动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有限，且在提供普遍金融服务方面尚存不足，但作为核心功能的保险服务却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证明其在降低农村居民风险、稳定收入方面的重要性。此外，信用服务作为衍生功能，在甘肃省的实施中尤为突出，显示出信用服务的加速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

6.2 政策建议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部，拥有丰富的科研、教育、国防及文化资源，对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起着关键的支持作用。为了推动甘肃省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增长，并缩小城乡收入差异，促进普遍富裕，应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投资于这一领域，增强投入，甘肃省可以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有研究证实，加速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然而，当前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地区仍有显著差距。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要任务是提升金融知识，增强金融素养。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拓展和稳定运行遭遇了重重困难，这主要归因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以及金融知识的匮乏。为此，提升这些区域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意识显得至关重要。观念的更新是个渐进过程，首要策略应强化金融知识的持久传播，例如通过播放公共教育宣传片、举办教育研讨会、实施激励性推广活动等方式，旨在增强贫困地区群众对金融行业的理解和认同。

第一，强化金融服务推广，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以刺激业务增长。

可以推行试点项目，引导部分群众率先参与金融活动，他们的积极体验将自然激发更多人的参与热情。针对农村的独特环境和业务需求，培养专业人才以提升服务质量，特别是对老年人群，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协助他们克服使用上的困难。另外，加强在贫困地区的金融教育，定期开展网络安全部署课程，教导居民识别欺诈手段，以提升其对风险的警惕性，确保个人资产的安全。这些策略能够协助贫困地区民众利用金融工具提升经济地位，进而减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鸿沟。

第二，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共享。

当前，金融资源倾向于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缺乏必要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突出。为响应国家共同富裕的目标，应同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金融资源共享。城市地区应构建高效创新的数字普惠

金融体系，引领农村地区的进步；农村地区则需借鉴城市经验，根据本地情况制定适应的金融策略，改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调整财政政策，优先考虑农村的资金投入，优化城乡公共服务和资源分配，确保收入分配公正，使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

第三，构建数字化的“新基型”。

数字化时代的金融服务基石在于高度发达的网络架构，它为普惠金融的深远、均衡和持久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当前，我们正全速推进数字环境的构建，并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的深化。然而，尽管技术日新月异，但在经济欠发达和边远地带，新技术的应用广度并未跟上普惠金融疾驰的步伐。因此，迫切需要增强对农村等边缘地带的数字化设施建设，既要强化实体设备的配备，更要着重提升诸如技术支持这类无形资产，以实现线上与线下服务的无缝衔接。

首要任务是推进基站建设的革新，特别是 4G 和 5G 网络设施的部署，强化光纤网络和无线信号的全面渗透，以此增强网络的无死角覆盖，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的触角能够深入到社会的每个缝隙，让每个人都无缝对接网络服务。政府部门应借此契机，通过制定前瞻性的支持政策，精心设计各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战略蓝图，为数字普惠金融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和广阔的创新空间。同时，通过财政激励措施，激励电信企业推出更为亲民的上网套餐，有效降低通信成本和网络接入费用，同时积极推广智能设备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这些举措将有力扫除接入互联网的地域性壁垒，使得数字金融服务得以普适全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塑城乡经济发展的平衡。

第四，提升数字经济的基石：强化信用体系并监管金融创新。

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往往在金融交易中引发混乱。尽管我国的征信体系初具规模，但发展历史相对较短，覆盖面尚未完全延伸至农村等偏远地区，这无疑阻碍了当地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理念相悖。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稳健运作和风险管控，急需构建先进的数字化征信系统，使之与普惠金融战略协同推进。

首先，增强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构建更为广泛的采集网络，确保信用评估的全面性，不仅涵盖城市中心，更深入至乡村和偏远地带，以便赋予所有人平等的

金融参与机会。其次，应积极运用前沿科技，如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构建一个包容且透明的数字化信用框架，它既要保证信息的即时整合和共享，又能兼顾用户隐私的保护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通过实时动态更新和广泛共享，这一新型征信系统将有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稳健发展。

与此同时，监管体系的完善同样至关重要。鉴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效率和多样性，亟需一套适应其特性的全面监管框架，确保市场秩序和风险防范。首先，修订监管法规，设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填补监管真空，确保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并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非法行为。其次，科技手段与传统监管相结合，运用现代技术提升监管效能。此外，要强化信息安全保护，完善隐私法规，严惩侵犯个人数据的违法行为。监管机构自身也需强化队伍建设，明确职责，提升专业素养，确保在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只有成立一个能高速、多元切合数字普惠金融特点的监管体系，促成经济发展和减小城乡收入差异面的效果才能得以发挥，这样的体系将有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and P. Bolton., 1997,“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4(2), pp. 151-72.
- [2] Andrei J, Erokhin V, TUREK A, DRAGOI C. Rural - Urban Income Gap and Labour Market in Romania[J]. *SHS Web of Conferences*,2021,95(3):148-165.
- [3] Burenmende. Research on Influen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Regional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C] //Proceedings of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Humanities Science (ETMHS 2015) , 2015,8(7):601-604.
- [4] Corrado G, Corrado L. Inclusive Finance for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7,24(2):53-59.
- [5] Demirguc-Kunt A, Klapper L.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C].CEMA Working Papers, 2012,NO.6025.
- [6] Donald R. Results of the 2012 Aorn Salary and Compensation Survey [J] . *Aorn Journal*, 2012,96(6):4-19.
- [7] Ekrem K. A Theory of Redistribution in New Democracies: Income Disparity in New Democracies in Europe[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7,49(3):258-267.
- [8] Fanta A B, Makina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C ross-sectional evidence[M]//Extending financial inclusion in Africa. Academic Press, 2019: 211-230.
- [9] Galor O. and Zeira J., 1993,“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1), pp. 35-52.
- [10] Gomber P, Koch J, Siering M. Digital Finance and FinTech: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2017,87(5).
- [11] Greenwood J. and Jovanovic B., 1990,“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pp. 1076-1107.
- [12] Grohmann. Inclusive finance for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Current*

-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7(24):19-23.
- [13] Jarvis D, Stoeckl N, Hill R, Pert P. Indigenous Land and Sea Management Programs: Can they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elp “Close The (Income) Gap”?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18,53(3):75-89.
- [14] Mahmud S. Urban and Rural Dimensions of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Income Inequality in Bangladesh[J]. 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30(3):167-175.
- [15] Mhlanga D. Industry 4.0 in Finance: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8(3):49-52.
- [16] Morshadul H. How Does Financial Literacy Impact on Inclusive Finance? [J]. Financial Innovation, 2021,7(1):24-45.
- [17] Nevvi W, Idqan F, Teguh I S.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Acceptance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 Anecdotal Evidence from Bogor City[J]. Independ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 Production,2018,9(4).
- [18] Ozili, P. K.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 Borsa Istanbul Review, 2018,18(4):329-340
- [19] Sahay M R, von Allmen M U E, Lahreche M A, et al. The promise of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post COVID-19 era[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0.
- [20] Sanati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Income Gap with Revenues and Charges of Metropolises[J]. Arth Prabandh: A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4(1):37-50.
- [21] 陈东平,丁力人,高名姿.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6):171-182.
- [22] 陈伟国,樊士德.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当代财经,2009(03):44-49.

- [23] Chaudhuri S, Ravallion M. 中国和印度不平衡发展比较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1):4-20.
- [24] 樊晓燕, 李洋.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中国西部, 2023(01): 21-30.
- [25] 范晓莉, 崔艺苧. 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1):106-116.
- [26] 郭峰, 王靖一, 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04):1401-1418.
- [27] 郭峰, 熊云军.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评论, 2021, 13(6):12-23.
- [28] 黄倩, 李政, 熊德平.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 改革, 2019(11):90-101.
- [29] 胡晶晶, 曾国安. 中国城市、农村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以广义熵指数进行的测度[J]. 消费经济, 2011, 27(01):19-22+14.
- [30] 花弘毅, 李曜. 农村金融机构、居民贷款可得性与城乡收入差距[J]. 金融研究, 2022(12):112-129.
- [31] 花亚州, 刘昌平. 教育对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平等与效率视角[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01):58-69.
- [32] 李慧平, 席玮. 财政支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J]. 江苏商论, 2021, (09):74-80.
- [33] 李牧辰, 封思贤.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文献的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20, 42(10):84-91.
- [34] 李实, 史新杰, 陶彦君等.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 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02):4-19.
- [35]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 2021, (11):4-13.
- [36] 李停. 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构分解及其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测算[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4):53-57.

- [37] 李竹薇,卢雪姣,杨思敏,王晓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 2021(12):1-19.
- [38] 梁双陆,刘培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121(01):33-41.
- [39] 刘锦怡,刘纯阳.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J].财经论丛, 2020(01):43-53.
- [40] 刘心怡,黄颖,黄思睿等.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J].金融经济研究,2022,37(01):135-149.
- [41] 刘鑫,韩青.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J].中国流通经济,2023(4):107-115.
- [42] 卢丁全,马利军.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路径探析——基于甘肃视角[J].甘肃金融,2021(11):77-82.
- [43] 罗丽丽,彭代彦.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6(02):66-71.
- [44] 明雷,马寅虎,张鑫然等.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23,42(10):44-61.
- [45] 欧阳金琼,朱晓玲,王雅鹏.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04):108-111.
- [46] 史云鹏,赵黎明,贺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基于东北三省的面板数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06):118-123.
- [47] 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06):14-25.
- [48] 苏春红,李真.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了吗?——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3):27-39.
- [49] 孙继国,曹薇.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差距视角的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23,(04):23-34.
- [50] 田霖,郭梦琪.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6.

- [51] 田霖,张园园,张仕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03):25-38.
- [52] 王曙光,刘彦君.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农村经济,2023(02):75-84.
- [53] 王永静,李慧.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统计与决策,2021,37(06):157-161.
- [54] 王钰.数字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1-13.
- [55] 吴先华.山东省城市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协调性评价[J].山东经济,2011,27(03):153-159.
- [56] 伍卓,周付友.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J].江汉论坛,2023(05):22-29.
- [57]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农村工作通讯,2021(20):4-6.
- [58]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 [59] 邢怀振,苏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18):78-82.
- [60] 徐仁刚,张心怡,梁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检验[J].现代金融,2023(10):22-29+11.
- [61] 徐莹,王娟.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J].农业技术经济,2020(09):1-12.
- [62] 姚志,谢云.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倒U型”关系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7(09):140-143.
- [63] 杨芳.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共同富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5):114-125.
- [64] 杨龙志,邵紫薇,魏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动共同富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J].经济论坛,2023(01):5-15.
- [65] 杨森平,唐芬芬,吴栩.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的倒U关系研究[J].管理评论,2015,27(11):3-10.

- [66] 乙寒青.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时代金融, 2022(06):40-45.
- [67] 易行健, 周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金融研究, 2018(11):47-67.
- [68] 尹应凯, 陈乃青.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06):13-31.
- [69] 玉国华. 农村信贷投入、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理论与实证[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11):78-92.
- [70] 张驰, 叶光. 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分布特征与收入差距——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经验证据[J]. 经济经纬, 2016, 33(01):78-83.
- [71] 张启文, 田静.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06):716-724.
- [72] 张小锋, 王菁彤.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J]. 商业研究, 2022(2):40-48.
- [73] 张远坚, 邓光君和陈雨飞.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中国商论, 2021(10):70-72.
- [74] 张云矿, 胡善成, 杨桐彬.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7(04):86-99.
- [75] 赵丙奇.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01):196-205.
- [76] 赵德起, 王世哲.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05):13-29.
- [77] 张倩肖, 刘怡杉, 刘虎.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效应的统计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3(18):139-143
- [78] 赵应云. 把握机遇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迈上新台阶[J]. 中国农村金融, 2021(03):14-15.
- [79] 周慧珺, 龚六堂. 金融发展与高收入群体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来自收入分布形状参数的实证检验[J]. 世界经济文汇, 2020(01):1-16.

- [80] 周利,冯大威,易行健.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J].经济学家,2020(05):99-108.
- [81] 周璐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2022,917(01):147-153.
- [82] 朱洪祥,雷刚,吴先华等.基于预警指标体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深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12):7-12.

致谢

行文至此，落笔为终。总觉得来日方长，毕业遥不可及，才发现三年求学之路，也即将来到收尾的篇章。我的研究生生活始于 2021 年初秋，终于 2024 年盛夏。

感谢我的导师马润平教授，有幸成为您的学生，您对学术认真的态度，给予了我学术路上的指引和帮助，学生心怀感激；您对工作的严谨，是我日后学习和工作的榜样。

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给我的爱，足以让我捱过每一个暴雨时刻。

感谢郭同学、贾同学和蒋同学的朝夕相伴。

漫漫十九载求学之路，像梦一样。回头看，那是一段热烈的、灿烂的、无畏的、充满着无数幻想的时光。画面转向现在，我的学生时代终究落幕，此时端坐在笔记本前的人，忽然意识到充实和自由并存的黄金时代，即将在不经意的瞬间离开我。时间就像一头驴，生猛地扎进生活的泥坑，我下意识地想要退缩，脑子里却想起苏轼的那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是结束，也是开始。

时已至此，我将以告别的形式适应我自己，成为我自己。

我还是会继续向前冲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